



# 大飢餓

大躍進、大饑荒六十年祭

王長才 著

# 目 錄

- 一 “超英赶美” 是为了赶超苏联
- 二 鞭子驱使的苦役和蛮干
- 三 千奇百怪的发疯折腾
- 四 “反瞒产” 逼出大饿毙
- 五 酷刑打压，索命罗网
- 六 厚赠外邦，饿死家奴
- 七 天府饥魂逾千万
- 八 空前绝后“人相食”
- 九 人居、生态全遭殃
- 十 旷世大难的演变和反思

# 《生命大劫难》

## 大跃进、大饥荒六十年祭

王长才 文

没有异常天灾，没有瘟疫流行，没有战争，没有内乱，完全由极权暴政的人祸造成了超过以前 2000 多年饿死总人数、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亡总人口的超大规模饿毙——打死、逼死、饿死几千万人，并出现了惨绝人寰、大范围的人相食……然而事后总是极力回避、掩盖这一生命大灭绝悲剧，更不待说追查责任、总结教训，匡扶正义、慰藉亡灵，从而导致十年文革的发生、善恶是非的混乱和人伦道德的失落，并且始终无法真正走出混沌、迷茫、愚昧、落后。

不忘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也是为了彰显人性良知和天理公义。在大跃进-大饥荒这一旷世大难发生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秉笔直书、揭示真相，是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是为了现代中

国的健康发展和民主进步，并藉此祭奠那只剩下了一个冷冰冰概数的魂无所归的冤魂们！

## 一 “超英赶美” 是为了赶超苏联

1957年11月苏俄十月革命40周年，全世界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和60多个共产党、工人党领袖隆重聚会于莫斯科。

中共领袖毛XX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也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一次国际活动：唯一安排住进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帝宫；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鞍前马后为其效劳；各国共党工党领袖走马灯似前往毛下榻处朝拜；赫鲁晓夫的讲话稿没有毛的同意绝不能发，没有毛点头的文章绝不敢发；毛要是不发话，赫鲁晓夫什么事情都办不成……表面上这个会是在苏联召开赫鲁晓夫是共产世界领袖，实际上背后的导演是毛XX赫氏只是个跟班的。

聚会期间，赫鲁晓夫请毛XX看芭蕾舞，

刚看一半，毛突然站起来说：“演的什么呀？为什么他们总是垫着脚尖蹦蹦跳跳，我实在受不了！”其实毛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也曾请他看芭蕾舞，毛不仅耐心看完，还向女主角献了花。在赫鲁晓夫举行的宴会上，赫氏兴高采烈谈起当年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情景，毛XX擦了一下嘴巴，把餐巾一扔，不耐烦地奚落：“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吃完了，你那西南战线的故事还有完没完呀？”

毛的大会讲话如天马行空，漫无边际，目空一切，语惊四座，令各国党首侧目仰视，似乎高深莫测却摸不着头脑。毛豪言要不断革命，表达了对苏共 20 大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外交方针的不满；他说巴不得再打世界大战，如打核战争世界死一半人中国死三亿人最好，吓得所有人大惊失色，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会后拿着咖啡杯直哆嗦，说中国有六亿人我们才二千万啊。期间毛还直接对赫鲁晓夫说：“第三次

世界大战应该在中国展开，待我们将美军引入纵深后，请苏联向我们投原子弹，一举全歼美军主力。可能因此死亡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换来一个世界大同还是值得的。”

那时候东欧各国有什么争论不下的问题常常就一句话，我们再等等，看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说，看看毛 XX 同志怎么讲。结果东欧国家认为毛的主张太激进太冒险太恐怖，怕被毛绑上与西方对抗的战车而不想再跟着中国走，因为他们跟苏联一样不愿打仗，也不愿没完没了地“革命”。

1957 年，中国“反右派”大获全胜六亿人彻底臣服，苏联也于当年在世界上率先发射人造卫星，社会主义阵营似乎占了优势，但毛 XX 认为赫鲁晓夫在共产世界威望不足、资历不足，处理东欧、波匈事件手段不力，他认为自己的资历、能力、智慧、威望和处理世界问题的水平都比赫鲁晓夫强，只有自己才能担当世界共产领袖的大任。但当赫鲁晓夫两次主动提出由中国共产党当全世

界共产党的领导党，由毛 XX 担任共产世界的领袖时，毛口头推辞不受，宣称仍然要“以苏联为首”，但却在斯大林问题、各国党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过渡还是战争解决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发起全面挑战；并一再羞辱、欺负、打压赫氏，甚至不顾及基本的外交礼节，一再将赫氏狠踩脚下。一次赫鲁晓夫到访北京，毛组织林彪、彭真等党国大员围攻赫氏，其中陈毅指着鼻子骂得最厉害，赫鲁晓夫愤怒回应：“我知道你是元帅，但我是总书记，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毛 XX 坐在一旁看笑话并冷言相讥：“赫鲁晓夫同志，你不要这样激动嘛！”

1958 年，毛 XX 在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后，突然单方面公布赫氏到访消息并下令炮击金门，致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同毛商量后故意制造紧张局势，试图挑起战争。一心想同美国缓和冷战冲突、害怕引发战争的赫鲁晓夫极其恼火却有口难辩。同

年，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提出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这一友好国家不难合作且对两国都有利的要求，毛却小题大作、故意发难，在尤金面前大发雷霆，扬言伤害了中国主权和他的自尊心，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赴北京作解释，毛却穿着睡衣在游泳池会见赫氏，要求赫到泳池中边游边谈，不会游泳的赫氏在泳池边手忙脚乱围着游水的毛XX转……赫鲁晓夫被如此戏弄，终于意识到再次蒙受了一场奇耻大辱。

1959年，美国送给台湾几枚响尾蛇导弹，台湾在温州上空成功试用，却有一枚未爆炸，苏联当时正在研究空对空导弹，一些关键技术尚未过关，遂请中国将那枚未炸的响尾蛇导弹送给苏方，中方却以种种理由推托不给，引发苏方强烈不满：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全是苏联援助的还在帮你发展核武器，现在我们要一个哑弹却不给况且还是别国的。赫鲁晓夫被激怒了，下令停止向

中国提供钱学森等正在进行的导弹研究技术，毛 XX 方才同意将这枚响尾蛇哑弹给了苏联。苏方专家收到后开箱一看傻眼了，导弹被拆得乱七八糟已无法还原，苏联最想要的红外制导系统的传感器却不知所踪……

中苏关系从亲密盟友到最大仇家，正应了中国一句俗语“一升米养个恩人，一斗米养个仇人”。当年毛 XX 像奴仆一样乞求斯大林援助，斯大林时常一毛不拔还没好脸色，毛却视斯大林为“伟大的导师和敬爱的父亲”；赫鲁晓夫继任后主动放弃中苏条约中有损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归还了旅顺基地，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全方位的工业和技术援助；斯大林援助的丁点军火几乎全是过时的二战武器，赫鲁晓夫却提供苏军现役装备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跨入了现代化；赫鲁晓夫还冒着极大的风险和压力，与中国签订了制造核潜艇和原子弹的援助协议，并从 1956 年就已开始实施。可毛却居高临下傲视群雄，一再向苏联要军工技术、工业装备还老

是狠踩赫鲁晓夫，两个共党巨头歧见日深中苏关系也不断降温。

毛 XX 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不但是社会主义阵营要压倒西方世界，而且是中国党要压倒苏联党，好名正言顺当共产世界领袖。还在莫斯科聚会期间，毛就在大庭广众下随意评论苏联党内的分歧和矛盾，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起立表达强烈不满，旁观者也感到吃惊，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当场给本国代表团传了一张纸条：“俄国人和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当首领的斗争开始了。”

然而，中国虽然是政治大国、人口大国还成了敢于与美国叫板的军事大国，但中国经济极度落后却成了毛最大的心病，因为当世界领袖可得要付出代价要花钱的啊。所以当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提出苏联要用十年时间赶上美国时，毛立即提出中国可用十年时间超过英国。毛“十年超过英国”的豪言当晚即电传到北京，第二天

就在人民日报辉煌亮相，以后又演变成为“十五年超英赶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此开始了鼓吹及发动大跃进。

毛XX搞大跃进“超英赶美”是假，其真实目的是赶超苏联、压倒赫鲁晓夫。毛宣称“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他时常要官员们将大跃进的经济指标与苏联对比，看相当于苏联哪个年代的水平，比苏联还有多大的差距，中国的钢产量距离赶上苏联还要几年，以便在经济上尽快赶上苏联，理直气壮压倒赫鲁晓夫，当上真资格的共产世界领袖。薄一波还在全国工业书记会上传达了毛的异想天开：“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

在毛XX大跃进臆症的狂想中，美国似乎真成了一扎就破的纸老虎，用不了多久中国就要变成四个美国还相当于苏联老大哥的两倍！

但苏联方面进行认真调研分析后，认为中国搞大跃进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且不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向共产主义过渡还为时尚早，也不应该搞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但为了不得罪毛和中国党，赫鲁晓夫要求苏联官方一律不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态。

1956年，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残酷大清洗，引起毛XX的警惕和不满，人民日报连发两篇重磅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点名批评苏共20大的做法，苏方不但未予反驳，还主动在国内发行了20万册、100万册予以宣传，给足了中国面子。但当毛沾沾自喜于大跃进狂飙突起许多国家莫名惊诧议论纷纷时，苏联所有的报纸和官方文件全都保持沉默，包括电贺中国国庆也只字不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令毛XX深感失望。1959年7月，中国大跃进搞了一年多后，鉴于其在苏联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思

想混乱，赫鲁晓夫在波兰访问遭记者逼问时，不得不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说在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不具备时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苏联 1920 年代集体化时也搞过公社，有过失败的教训。

正在庐山会议上狠斗彭德怀的毛 XX，看到外交部送来的情报后极度震怒，他认为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他为共产世界开辟的发展新路和创造的最佳组织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不但没等来苏联的支持还要说三道四、大泼冷水。毛怒称要向赫鲁晓夫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行为宣战。他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上批示“是不是苏联失败了的東西我们就一定要失败？”并下令印发全体与会人员，同时要求手下查找马恩列斯的论述以证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正确的，并责令人民日报刊发赫鲁晓夫讲话予以批驳（不知何故未刊发）……进而成为了毛坚持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搞到底，并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反目成仇及至大举

“反修”的主要原因。以至后来赫鲁晓夫做出撕合同、撤专家的激烈反应引发举国震惊、纷纷谴责时，只有毛 XX 默不作声，未置一词，因为他最清楚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

毛 XX1958 年向中共高层打招呼，大跃进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事实很快证明，大跃进的荒唐足以令全人类耻笑一万年，大跃进的残忍、野蛮和血腥令人毛骨悚然，短短几年打死、逼死、饿死的中国人超过了以前 2000 多年饿死人口的总和，几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于战争的总人口。人们不禁要问：如此荒谬绝伦、惨绝人寰的一场几亿人参加的运动，为什么没有受到抵制？何以能在中国顺利实施？

毛发动大跃进的冲动由来已久，为了排除阻力，早就开始了降服异己，迫使党国大员臣服。土改刚结束便以合作化名义开始收缴农民土地，接着以敲打刘少奇、批判高岗等大员推行极左的农村政策。1955 年，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共元老邓子恢委婉劝说搞合作

化不可太激进，被毛痛骂为“小脚女人”而靠边站。1956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针对不断“反右倾保守”逼出来的高指标造成的全面紧张，提出“反冒进”、削减投资的稳健发展主张，正在不断反“右”的毛XX，立即针锋相对地“反‘反冒进’”，开始痛批刘、周、陈的“反冒进”，并在短短几月内实施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1958年初，毛在“反右派”大获全胜后，接连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发动大跃进的会议，提出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以一己之力擅自推翻中共八大决议，并把刘、周、陈经济上的反冒进跟“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指斥负责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五十米了”，一再当众羞辱周，迫使周一次次作检讨，还明令要周自己写不准秘书代笔；接着又令周在八大二次会议（全国党代会）上面对1360名代表当众检讨，谈他如何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猖狂进

攻，反右运动才使他“开始觉醒”。

周恩来被整得痛苦不堪，几近崩溃，从此彻底臣服于毛，以后一直冲锋在为毛当差的最前列。毛对周的整肃起到了杀鸡吓猴的作用。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相当于自己打自己耳光，不点名地批判他本人在1956年说的“宁可慢一点好”这一类话。小组会上，毛组织地方大员对刘进行围攻，说他批评得不够，语气太轻。陈云和李先念也就“反冒进”反复作了检讨，陈云不久即称病退隐江湖。毛同时激烈指责刘、周手下管经济的人，搞得许多人紧张得睡不着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一机部部长黄敬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受不了毛的压力突发精神病，语无伦次大叫“饶命”，不久就死在医院，人称“被毛吓死了”，年仅46岁。毛的“大跃进”主张得以顺利实施，全国很快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热潮。

而从全国范围和社会背景看，那场活活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大饥荒之所以会由

荒唐的人祸而起，则完全是在极权暴政的重压下一步步酿成的——通过建政初期土改、镇反等大举“杀人立威”的强烈震慑和社会恐怖，已没有人敢对毛的“指鹿为马”表示异议而甘当顺民了；通过大批判、三五反、肃反、反胡风、三大改造等接连不断整人害人、思想改造、人身控制和谎言洗脑，人们已不得不承认了“鹿”就是“马”的专制逻辑而甘愿跪地为奴、三呼万岁了；通过以“阳谋”、“引蛇出洞”再行反右派把说真话的人一网打尽的全民“封口”，从此绝对没人再敢对毛XX带领各级官员的胡作非为说一个“不”字，从而把所有中国人“逼良为娼”，全都改造成只能吹牛撒谎、互相残害的奴才和暴民后庚即进行的“大跃进”，在种种集中营式管控、农奴式驱使、强迫服苦役和强制共产、举国浮夸、人身打压的滥施淫威中，大炼钢铁、大办水利、高产卫星、公共食堂和各种“发明创造”等痴人说梦的疯狂蛮干，一场场企图把“鹿”变成为

“马”的全国瞎折腾——“大跃进”，终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 二 鞭子驱使的苦役和蛮干

有了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有了中央领导的集体就范，有了“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有了几亿国人不能不当奴隶的盲从，1958年，“大跃进”的战火迅速燃起。当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开始大跃进，同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大跃进”的目的是一夜间建成工业化的超级大国，所需资金和物资来源则是广大农村和农民；大跃进的核心内容是多产粮食，以便征购更多的粮食换取更多工业设备、技术迅速实现工业化。随着全国发疯似地广建工厂、大上工业项目，为了多产粮多征购以满足工业建设大干快上的物资和资金需求，全国由上而下不断鼓吹“放卫星”，粮食产量层层拔高，并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

跃进，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全民大办”。全民诗歌运动、壁画运动、大表决心、互相挑战等各种造势，则把大跃进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江苏邳县一下冒出 15000 个“美术骨干”，一个月完成壁画 183000 幅；官湖镇 70 个整天下地劳动的人，一夜间就画了壁画 500 幅。河南南阳县 168000 多人投入这一运动，五天内写出诗歌、文章 550 多万篇。不少地方“歌成海洋诗成山，跃进歌声飞满天；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须半杆烟”。

大跃进狂飙突起，权力鞭子的驱使、整人政治的恐怖加上乌托邦天堂的诱惑，冲毁了一切理智和良知的堤坝，干部们一夜间似乎全都变成了疯子、骗子、暴徒，变成了用鞭子驱赶奴隶的流氓、恶棍、打手，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风靡全国——共产风几乎吹掉了所有农民的私人物品，包括大肆拆毁农民住房，砸掉灶台炊具只能在公共食堂喝大

锅清汤；浮夸风如高产卫星、虚报成绩、“发明创造”等形形色色的吹牛撒谎造成暴力高征购等可怕的后果；强迫命令风使得各级干部可以任意惩罚甚至活活打死人，以强制农民无休无止下苦力；瞎指挥风造成劳民伤财、败光家业的蛮干及生态环境破坏；干部特殊化风使各级干部能够随意残害农民及享受生活的特权……“五风”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恶，搅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犹如世界末日来临。

大跃进留给世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把各地农村搞成了一个一个强迫下苦力的奴隶劳动营。陈伯达把毛 XX 的大跃进思想概括为“一天等于二十年”，得到了毛的赞同，成为大跃进中与“超英赶美”媲美的口号。为了完成人力根本无法完成的劳动任务以实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高指标，注定了以原始工具为主的中国农民首先要吃尽拼命劳动的苦头甚至要付出活活累死的代价。

为了更加方便地驱使农民服苦役，各地

普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组织形式。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XX提出消灭家庭，共产、共食、共居的新村乌托邦主张，各地闻风而动，“消灭家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形成风潮。许多地方拆散家庭，按男劳力、女劳力、老人和孩子重新组合，分别住在不同连队，分配不同的劳动定额和食堂定量，不到规定时间不能见面。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许多民房被强制拆毁，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四川日报记者石韞玉撰文感叹1958年：“这一年，四川农村像是一个大战场，每个农业社又象是一个大工厂，白天千军万马齐出动，夜来明灯万盏满天红，生产运动开始就是高潮，高潮就是开始。”人民公社成立后，这个大战场更是厮杀得日月无光，所有的农村劳动力几乎成了不眠不休的永动机，

人民公社成了强迫劳动的集中营，老百姓被驱赶着没日没夜、没轻没重下苦力。有的地方甚至在每个人身上缝个数字编号代替这个人，硬是把人当成牲口一样驱使。我当年还是上初小的城市学生娃，也亲身参加过“挑灯夜战”服苦役。

“大办工业”、“大办水利”抽走了精壮劳动力，中国农村人口密度最高的四川温江地区（现成都市区县）劳动力突然紧缺。大邑县在一半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的情况下，从10多岁的小孩到70岁的老人全都被编入野战兵团，打破乡社队界限，采用运动战、阵地战的方法，征战东南西北，四处安营扎寨，轮番转移作战，“白天紧张劳动一天，天黑又连续夜战”。

驱使劳动的方法是没有人性甚至兽性不如的打压。一夜间，中国社会猛然跌落进变相囚禁、强迫劳动的野蛮时代。四川荣经县年轻妇女周国勋因子宫脱垂无法出工，被生产队长丁永全用锄把从阴道活活捅死。垫江

县社员郭士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队长强令出工致其死亡。长宁县农村私设监狱强迫劳动，桃坪公社中坝管理区（大队）劳改队11岁女孩陈玉秀连续干活五天五夜，口鼻流血活活累死。河南商城县上石桥公社阮岗大队党支部书记手持木棍强迫王天福、蔡振礼等7人在冰田里拉犁，结果当场致死3人。重庆江北县冯银山家有人患肿病不能出工全家被扣饭，一家7口人全部死绝。

大跃进中各种“大办”在全国刮起一阵阵风：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粮食，大办养猪场，大办商品生产基地，大办集体新村……“大办”的资金和物资都是无偿没收农民财产甚至强拆农民住房得到的。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白天红旗如潮，晚上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晚上站在山头上督战，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得最好。

这种大兵团作战和强制劳动，不仅造成窝工浪费、劳民伤财，还使得各级干部的瞎指挥、强迫命令、欺压群众造成的打人、体罚达到了极致。大跃进中河南邓县裴营公社共打死逼死累死社员 2535 人、开会斗争 2840 人、体罚劳改 1842 人，房屋损毁 11000 多间。四川合川县南坪公社打死逼死 496 人，其中吊死、打死、活埋 42 人；打残、打伤 62 人；患病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致死 392 人。河南虞城县李庄、吕楼两村 80% 的群众挨过副队长代明扬的打，代并一次毒打斗争 17 人。湖南澧县梦溪公社又新大队干部傅绍发为了强奸一个贫农的女儿，竟当面通知女方父母，如不答应就要遭受做重工、服苦役、扣饭等处罚。

为了最大限度下苦力，河南永城县要求所有人大冬天都得脱光上衣劳动，一个叫窦兴智的农民脱衣慢了点被打断脊梁骨。湖南平江县东方红公社东安大队要求干活时“男人要打（赤膊），女人也要打；媳妇要打，

姑娘也要打。”年轻媳妇和姑娘们不肯脱光上衣打赤膊，就立即被戴上破坏分子帽子，干部和积极分子们一拥而上，强行把她们的身上扒光。此“经验”推广到公社，立即开展了“赤膊上阵”的“共产主义大竞赛”和打赤膊“拔白旗，插红旗”评比活动，有的队干部手持棍棒和绳索，围着打赤膊的妇女们督战。有几个姑娘媳妇羞急大呼“救命”，包括其家人没有一人敢挺身救助。平江县石塔公社三和大队李月莲来月经请假不出工，竟被要求脱裤子检查，队长李玉良强行把手伸进姑娘裤子里摸。三和大队的“摸一把”成为先进经验在干部中间传播，红旗公社、拥江公社、红色公社等纷纷效尤，有的摸起来就没完。三阳公社石坪大队洪笑英在水库工地来例假经血流到了脚背上，找大队总支委员唐绪普请假，唐不但不准假还狠狠抽了她两耳光。

下放改造的右派分子们更是被迫昼夜下苦力。云南红河州劳教农场经常将右派等赶

出去连续一个“苦战八天八夜”又一个“苦战八天八夜”，当劳教人员用雨点般的汗水培育出各种农作物时，当局又命令将这些禾苗通通铲掉，改种产量高的红薯，以确保卫星上天。于是又强迫劳教人员一个“苦战十天十夜”又一个“苦战十天十夜”，去铲除上千亩禾苗，重新翻整土地。如此折腾了大半年，“高产卫星”没看到却整死累死了多少人。接着又奉命开采铁矿，再放“钢铁卫星”，没有任何安全防范，坑采右派非死即伤。炼钢铁没有炉子，就到处去刨人家的祖坟，不管是现代的古代的，见坟就刨，取出砖来造土炉子；没有燃料就去乱砍滥伐森林，把一片片茂密森林通通送入炉子烧为灰烬，使一座座青山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坡。

1958年与人民公社同时兴起的，首先是共产风和公共食堂。河北徐水县一马当先，率先提出1959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毛XX先后到这里视察，高度赞扬并向全国宣传，中央也派人到这里试点，全

国 32 万多人到徐水参观，共产风在各地猛刮起来，很快出现了一批赶超徐水的典型——1958 年 10 月，山东寿张县做出两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莒南县提出大干 200 天，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 年 11 月，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包括两年内实现全县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 2 万斤；建成 4 至 6 所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

湖北当阳县跑马乡的公社书记 1958 年 11 月 7 日当众宣布：今天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明天进入共产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全公社 5800 多户社员也由原来居住的 1200 多处集中到 62 个居民点，造成大量民房毁灭和牲畜死亡。集中后往往几家同

室，异常拥挤，如同囚犯监牢。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子盖一条被，孩子把被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睡觉。

共产风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大量住房被强制拆毁，私人物品收缴一空，生产队的东西也被任意“一平二调”。四川仁寿县方家公社胜利管区在出工之前集合，强令所有社员交出家里的钥匙，社员下地后，干部们挨家搜查，将群众家里的粮、棉、铁器等统统搜走。与此同时，生产工具大量丢失，生产力大受影响。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 1958 年共有中型农具 2686 件，到 1961 年仅剩 515 件，丢失率达 82%。该区四生产队原有晒席 110 床，丢失了 93 床，1960 年收获水稻时，因缺晒席翻晒不及时，稻谷生芽 20000 多斤。第一生产队原有犁、耙 106 架，丢失 96 架，因此不能及时整田赶上插秧，使 80 亩中稻迟插 20 多天，还荒田 30 亩、地 60 亩，减少粮食产量 30000 多斤。

强制办公共食堂更是消灭家庭、掠夺农民的过程。农民粮食被收缴一空，灶台被拆被砸，铁锅投进土高炉，私藏粮食者受到捆绑吊打等严厉处罚。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吃，使干部拥有了一个致命的权力——可以任意“扣饭”，剥夺社员的吃饭权、生存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重庆江北县社员朱海清患肿病不能出工，被干部连续扣饭两个月活活饿死；社员蓝权患病不能出工被扣了30天饭，不久就饿死在挖野菜的山坡上。荣经县不少社队都豢养着几个打手，他们吃饱了就背着枪日夜巡查，发现哪家房子上冒烟便冲上门去没收食物，砸锅砸灶，甚至对户主进行捆、绑、吊、打、罚跪等折磨。

新华社老记者李锦回忆，其家乡江苏射阳县兴桥大队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全部收到食堂，又把所有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不准自己做饭。公共食堂建立一个多月，饭里

就看不到米了，接着吃用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淀粉圆子，后来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到1959年初便开始饿死人了。

当年我在原籍四川西充县城，由于城镇人口有国家定量供应，总体感觉比农村好得多，一般不致山穷水尽饿死人，但干部的多吃多占却使普通居民能吃到口的大打折扣，并亲眼看到城关镇及地、县等上面干部或什么“检查团”“观摩团”时常来到街道食堂大吃大喝、白吃白拿，普通居民却只能喝大锅清汤还不敢说什么。食堂炊事员亦因之成为干部的帮凶和既得利益者，其饭瓢也是长了眼的，吃亏的自然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莫言描述农场炊事员张麻子大饥荒中利用掌握饭瓢的权力，以食物为钓饵，几乎把全场女右派诱奸了一遍。河南一位十五六岁女生享有每月23斤供应粮，为省下点粮食救济农村的家人，她每天只吃二三两。极度的饥饿把她折磨得面黄肌瘦、走路打晃，难以正常

上课，被退学回家，23斤供应粮没有了，回家不久就活活饿死。

大跃进还未开始，全国就按毛XX的号召搞起了“大办水利”。

“大办水利”肇始于1957年10月。1958年开始，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那时全国总人口6599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55303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2.65亿人。一亿农民搞水利，相当于每2.65个劳动力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更多。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陷在水利工地上。到1958年4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水利的劳动日达130多亿个，完成土石方250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石方铺成1米厚、66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我还上初小，同城镇大人们一起时常被派各种“义务劳动”，下乡“大办水利”是干得最多的活，大多是

挥舞锄头、铁锤、钢钎建“蓄水池”。山坡地薄薄的土层下面全是岩石，全凭下苦力拼消耗，一点点打碎了挖出来……后来发现那些千辛万苦建成的蓄水池及沟渠，由于胡乱选址及缺乏配套等原因，几乎全都成了无用的废石坑还损坏了自然生态。

全国四年“大办水利”移动的土石方，相当于建造 950 条苏伊士运河。主力军自然是农民，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榔头、铁铲、扁担、箩筐，靠农民自带。劳作时吃的东西也得自己出，经常在露天搭起棚帐安营扎寨，长年累月变相劳改在工地。肚子空空的农民们一天劳动十多个小时，或挑着一百来斤的担子奔跑，或挣扎着飞快地挖土。工地上的干部作风极为恶劣，对农民任意打骂摧残，打死饿死累死等各种死人司空见惯，毛 XX 也时常把劳动量同死人多少挂钩。1958 年 4 月，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两省第一书记）：“吴芝圃讲搞 300 亿方，我看

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 200 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被打成了右派反党集团。

1958 年 6、7 月，上海奉贤县在“大办水利”中，提出“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据调查，该县在水利工地有 4 人被活活打死，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 95 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 131 人，生病不准就医而致死的 205 人，不准父母回家照看致使生病儿童死亡的 411 人，其他因严重强迫命令造成死亡的 114 人。另有被各公社私自劳改的农民 4000 多人，还举办了变相劳教的“儿童集训班”，受“集训”处罚的儿童最小仅 6 岁。

1959 年庐山会议“反右倾”致全国进入饿毙高潮后，在各水利工地上变相劳改的农民基本上是饿着肚子服苦役。中央调查组王

从吾（中央监委副书记）1960年12月在河南省的讲话中披露，仅固始县三个水利工地上就累死打死饿死了17000多人；上蔡、新蔡、罗山、遂平和豫北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饿死人也极多。固始县七一公社上元大队200多精壮劳动力上水利工地，结果死了160人，有一家父子兄弟6人都去了，全部死光。

付出如此巨大牺牲搞的“大办水利”，并未收到应有的效益。大跃进初期上马的500多座一亿立方以上大型水库，一年多即减少到200座，建成的也大多成了隐患工程，不少水库后来相继垮塌。

除了公社化、大办水利和放高产卫星，1958年中央北戴河会议安排的战斗任务还多着呢：要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白旗”、“灰旗”、“黄旗”统统拔掉，制定更大的增产丰收计划，掀起更大的生产高潮；要把土地全部深耕一遍，标准是一尺以上，丰产田二尺以上；要突击积肥、造肥，

分层施肥；要继续除“四害”，创造出更多四无乡、四无县、四无省……

样样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样样都必须全力以赴、坚决完成。共产主义的临近煽起了幻想和热情，强大的政治压力、暴力逼迫扫除了障碍，一切狂想和胡闹畅通无阻、愈演愈烈，每个人都被大跃进的鞭子驱赶得团团转。

创造人间奇迹的方法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战斗，是不分白天黑夜、通宵达旦强迫下苦力。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仅修建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温江地区就调集了10万民工。一批批男劳力离开了田土，妇女、儿童、太婆、大爷以及残废人、卧床不起的病人都被赶起来，一路上娃儿哭女人叫，在冬季的凄风苦雨中“奔赴战场”。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地方工业，后来又炼焦炼钢铁，劳力十分缺乏，所有妇女、老幼被驱使到生产一线，庄

稼勉强种了也收不回来，更没法干家务照顾家庭。

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的国家农奴制，使得干部的权力无限扩张，生产瞎指挥、欺压百姓、打骂农民成了家常便饭。四川温江县农民龚明通出工慢了点被支部书记罚扣饭 15 天，龚挖了些红苕充饥被打成重伤逼死。大明管区支部书记强令病员肖有根从公社背米回管区，肖走得慢了些，就以“磨洋工”罪名暴力折磨，致肖上吊自杀，肖父活活气死，肖妻精神失常，幼子无人照看也很快死亡；周玉明得了肿病，管区主任仍强迫其出工，周昏倒在地，被指抗拒劳动，遭毒打后致死。荣昌县李洪英患了严重肿病，干部强令他下水田干活，其妻苦苦哀求不要派李下田，结果被干部打耳光还扣饭两天，李洪英下田几天即命丧黄泉。广东南雄县始兴公社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抽脚筋。

四川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搞“大兵团作战”，把全区七个队的几百个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搞“深耕”，180人挖一亩多的一块田，拼命挖了一天一夜，麦种用了60斤，最后的收成还没有种子多。劳动力集中以后，其他各队都误了生产季节，造成了大量荒地，四队共有田129亩、地172亩，1959年小麦只种了40多亩，而且是在农历11月才播下去，结果小麦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63%。在农业大忙季节，还把大量劳动力调往水利工地，插秧的季节也误了。一些公社把这个队的人调到另一个队去插秧，把另一个队的人调到这个队里除草，致使大片土地抛荒。成都市金牛公社荒芜土地5400多亩，插秧季节已过而没有插的有1000多亩，插秧后因管理不善而没有收成的有4000多亩。

上海奉贤县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的棉花78891亩统统翻掉。四川乐山县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区一些撒了谷种并且发了芽的秧田，由于不符合上级

“整齐好看”要求，命令农民把发了芽的谷种一粒粒拾起来重新整田撒种。43 亩没有按统一规定种植的洋芋地，苗已经长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经结了小洋芋，也要挖出来重栽。插秧则必须带尺子和绳子，不合整齐划一要求的一律返工。气温已经很高了，还强令社员用火温床育红苕苗，结果烤坏红苕 11000 斤。规定霜降前不准挖苕，结果霜降过后气温骤降，大量红苕烂掉。春耕大忙季节本应集中力量插秧，却让大批劳动力去搞“园田化”，错过了水稻直播季节。170 多亩深田、冷浸田，本来只适合种中稻，上级却强迫种了早稻；100 多亩适合种红苕的地却强迫农民种了包谷，仅这两项起码少收粮食 40000 多斤。

毛 XX 说美国无非是钢多一点，外加几百颗氢弹，他认为钢产量上去了经济就上去了，于是提出“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在 1958 年 6 月底突然提出当年钢铁产量 1070 万吨，要比 1957 年的 535 万吨翻一

番。

正规钢铁厂日夜加班连轴转，还是远不能完成指标。到1958年8月底，眼看时间过了一大半，离1070万吨还远着呢，于是发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被“强制性”（毛语）卷进土法炼钢的人起码有9000万，全国农村、城市包括机关、校园甚至中南海里，到处都建起了小高炉。

四川省一夜之间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上千万炼铁炼钢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成都周遭的温江地区缺煤缺铁矿，全区抽调50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荡向西部山区进发。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

炼钢需要废铁，便逼着人们把家里的金属制品交出来，“有铁交铁，没铁交头”，

从文物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有用没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门上的铁环铁锁，做饭的铁锅铁铲，宝贵的家具农具，也填进了怎么也填不满的土高炉。陕西富平县驱使老汉、老太全都到野外找矿石，只要发现哪个石头或山土是红色或像铁锈的颜色，就当矿石背回来。有个小脚老太背不动，就用手帕包上一块石头提着走。几船从苏联高价买来的优质合金钢，也被某地干部偷偷扣下来送进了土高炉。中医们还大胆创造用中药炼钢，向土高炉内添加槐角、鸡胃、龟甲等中药，据说能提高炼钢能力。

为了大炼钢铁需要的燃料，长满森林的山岭被砍秃，农民的房屋被扒掉。四川还创造了“大窑炼钢”新工艺：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填满，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石不是矿石、铁块不是铁块的黑东西，敲锣打鼓抬去报喜。

我上初小时被卷入“大炼钢铁”，和孩

童们一起钻过老坟洞搬砖块、捡铁钉，在县城炼钢集中地为土高炉拉过风箱。农村的男人们则是一天24小时围着土高炉转，收获季节到了，收庄稼只剩下妇女和儿童，大片庄稼收不回来，烂在地里。彭德怀感叹：“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

1958年，全国风调雨顺，虽经一系列疯狂的折腾，仍然是一个难得的丰收年，但青壮年农民全都抽去大办水利、大炼钢铁了，许多地方庄稼烂在地里没有劳动力收割。山东郓城县部分庄稼收割后运不到场院，堆在地头发霉变质，或拉到场院无人脱粒而沤烂。甘肃秦安县好劳力都上了洮河水利工地，做庄稼的全是七八十岁的老汉，他们一边打场一边不分昼夜往乡上大粮站送。四川温江地区秋红苕逾百万亩，长得极好，但到挖红苕时腾不出劳力，从省到县又是开会又是发紧急通知，结果无济于事，红苕要么烂在地里，要么挖起来堆在地边烂掉。

如此折腾到年底，人民日报终于以套红标题报导 1070 万吨炼钢指标达到了。但就像毛自己承认的：“只有四成是好的。”这四成实际上是正规钢厂炼出来的。土高炉炼出的最多不过是生铁，大多连生铁也够不上，是些毫无用处的“牛屎疙瘩”。

全国一窝蜂兴起的“大办工业”，也几乎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从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到年底短短几个月，中国上马修建的大型企业达 1639 个，最终只有 28 个建成投产，浪费的设备许多是大量出口食品、花巨资从苏联买来的，因为没有基础设施、配套产业而闲置一旁，任其生锈报废。1959 年 6 月，苏联副总理、冶金专家扎施亚科访华后向赫鲁晓夫汇报：“他们简直把我们的东西都遭蹋了。”

正常生产的各类企业也像人一样不得片刻休息，重大事故接连发生，几个月内最少有 30000 多任务人死于严重工伤，产品质量更是毫无保障。鼓起勇气提意见的专家被当

作“白旗”拔掉。毛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非常亲华的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回忆：“我请周恩来和陈云劝毛不要瞎指挥，但毛不听。他们告诉我：对不起，毛主席不同意苏联方面的意见。”

### 三 千奇百怪的发疯折腾

1957年“反右”打断中国人脊梁骨致全民“封口”后，偌大中国说假话、听假话、做假事、歪曲事实、竞相吹牛成为社会风气，“大跃进”便成了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大表演。几亿中国人顶礼膜拜皇帝的新衣拼命跟着裸奔，名贯中西的大科学家钱学森竟然三次“科学论证”亩产万斤不成问题。在从上到下的大施淫威和从下到上的盲从跟风中，一出出搞得人心力憔悴直至榨干人生命力的荒唐闹剧，不断上演了。

毛 XX 开初主要是想尽快实现军事工业化。1953年毛首次推出这个计划时，曾把实

现的时间定为“十年到十五年”，后来又缩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随着大跃进调门越来越高，毛看到一呼百应、全国火热的“大好形势”，似乎通过搞大跃进统治世界也不在话下。1958年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不久又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

中共建政后，开始以剥夺农民的方式搞工业化，以统购统销和建立合作社等方法向农民征购粮食以积累工业建设资金。为了获取更高的粮食产量从而征购到更多的粮食，然后大量出口换取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使得大跃进的农村首先就是为了创造粮食丰收的奇迹。为了创造这个“奇迹”，毛XX农业“八字宪法”中的深耕、施肥、密植三大“高产措施”，搞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毛XX一声号令，全国“土地大翻身”运动如火如荼，土地一尺又一尺深挖下去，“深

耕卫星”一个又一个冒出来，二尺三尺已不稀罕，四尺五尺不算冒尖，四川蒲江县东北公社玉红大队挖到了七尺，超过篮球巨人的身高。如此艰巨的深耕任务，畜力望尘莫及，拖拉机也无能为力，各种深耕工具便应运而生。温江地区普及最广的是所谓“绳索牵引犁”，数人、数十人拉着犁头深耕；或者在田头支上绞盘，由许多人推磨似地转动绞盘，带动绳索拉犁，其场面恍若奴隶时代。人民日报报道，温江地区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制作绳索牵引机。都江报说，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

至今依然记得1958年在原籍西充县城郊看到的巨幅标语：“良田万亩，深耕十丈，高产卫星，到处发放”；旁边则是农民站在肩及地面的深沟里，将一米多深的泥土和石渣从一侧向另一侧、由下向上一锹锹翻过去。“深耕”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埋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为了把

川西坝子（成都平原）精耕细作了几千年的土地彻底翻个身，温江地区规定了翻“表土”、“生土”，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烧柴火“熏土”，在熏土上泼粪水，再在其上施渣肥、堆肥等“深耕”操作程序。“深耕卫星”放得蔚为壮观，深耕的土地上到处挖起战壕似的深坑，叠起一列列土墙似的土埂，修起一座座碉堡似的熏土窑。一时间，成都平原上遍地是坟场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区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烟雾弥漫，花费了多少劳动力，烧掉了多少林木柴草，却搞成了毁灭性的生态破坏！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也参加过“熏肥”，在学校旁边的农田里，跟着大家把大个头的土块逐一垒成中空的土堆，然后陆续填入随便哪里弄来的木料、柴草，将这些土块烧黑，熏成“肥料”。

与此同时，农业部出台抓紧积肥的紧急通知，人民日报社论呼吁“鼓起劲来，大量

积肥”，各省、地、市、县也出台了天文数字的计划指标。牲畜粪、人粪，一粒不掉，杂草铲来沤堆肥，各种河沟水塘的沟泥、塘泥挑完了，稻秆麦秆玉米高粱杆子烧成了草灰……埋死人的坟头是肥，老土墙是肥，小路、院坝、屋里屋外经常有人走动的地面也要刮起一层“千脚泥”当肥料。

人民日报告诉人民，农村的土墙经长期风吹日晒雨淋后，在墙根常发现许多像碱一样的白霜，这就是硝酸盐类物质，用老土墙做肥料，比河泥肥效高两三倍；每天煮饭所烧的柴草中的植物蛋白燃烧后放出氮气，被灶土吸收，所以灶土也是好肥料。于是到处都在挖土墙砸灶台。温江地区一夜间就办起几千个土化肥厂，见老墙就挖。土专家们只须一把铲子、一张筛子、一只铁锅，就制造出种种“高效化肥”。

四川日报报道，新繁一块一亩二分“卫星田”施老墙泥40万斤、堆肥5万斤，以及人粪、水粪、草木灰、鸡鸭粪数百挑。有的

试验田甚至“每亩施渣肥 170 万斤”，相当于每平方米堆上 1.28 吨肥料。

著名作家李准在人民日报上感慨万端：“当你看到一块红薯地里堆满 10 万斤粪，又深翻一丈深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之所以能获得这些丰产，主要是人民树立了共产主义的风格——毛 XX 的风格。”

毛 XX 一个“密”字——密植，经各级层层放大，也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密植的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播的种，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拔掉重插重播。不仅重新返工，还要受政治处分，当作“白旗”拔掉，作为“右倾保守”批斗，甚至丢掉性命、家破人亡。华北一位极受农民欢迎的村支书、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干部，1958 年上级要求用三条腿的耩播种以提高种植密度，但这个村支书坚持用传统的两腿耩播种，结果遭到“拔白旗”，站在板凳上挨斗争，被狠狠踢下打翻在地。

四川省委宣传部选编的一首“跃进诗”：“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四川荣经县指导县中学生在河滩上选了一亩试验田，深耕五六尺，翻起河沙、卵石，挖出一个大深坑，回填后再施肥 200 担，然后按密植要求密密麻麻撒种 100 余斤，结果长出的秧苗细如牛毛还日渐枯萎，只好全部割掉做了牛饲料。郫县红光公社密植的油菜地，有的菜籽还未开花就干了，无花更无果，有的花开后没有角心或颗粒，同时出现大面积的油菜黑菌病，叶子发黑后生霉，然后全部干掉。

有的一亩地就播下几百斤种子。由于过度密植，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庄稼长不起来，长起来也要倒伏。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来公社检查工作的温江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

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是党中央规定的，“密植”来自毛的最高指示，必须执行，谁也不敢反对。

直到交够了学费，吃够了苦头，最后还是毛 XX 自己出来说了句“不可太密”，方才逐渐松绑。

种种稀奇古怪、不计本钱、劳民伤财的蛮干，都在大跃进中一一创造了出来。四川崇宁县（后分别划归灌县、郫县、彭县）强行推广的几十万亩双季晚稻，直到 9 月份还未抽穗，全县召开保晚稻丰收誓师大会，各社组织劳动大军日夜守护在田间。灵圣乡用草木灰、鸡、牛屎等“热性肥料”提高地温；君平乡每人“自动节约菜油三至五两”混合粪肥施到田里；万寿乡给几十亩“晚稻大卫星田”抽沟排水、拦腰搭架、分厢梳头；金星社在田埂四周生火，用竹筒把暖气输入田中，在田埂四周放火盆“抵抗低温侵袭”，或用牛骨头熬油喷射促进提早抽穗扬花。

为达到高产目标，有的地方给高产田安

上煤气灯增加光合作用，有的在田边安鼓风机向田地吹风。有的发明了煮狗肉汤做肥料，不管是谁家养的狗，也不管是什么品种，统统当众打死，不用开肠破肚，整个扔到大锅里煮，狗肉汤撒到田地里，说是庄稼喝了能增产。陕西富平县把狗全部打死后，熬成精制肉汤泼到田地里。有的地方发明了给小麦打“葡萄糖”，在小麦地里用木棍打好密密麻麻的洞眼，往里灌人粪尿搅拌好的稀粪汤，说是庄稼会长得快，谁知没过几天麦苗全黄了，原因是小麦根系遭受破坏，难以吸收过多的肥料，烧死啦。为了早出粮食，湖南湘阴县号召农民吃过年饭浸禾种，结果因为土地还很冷，播下去的9.42万公斤种子全部烂掉了。

高产的大话说绝了，荒唐的方法用尽了，几亿农民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实际的粮食产量却远远赶不上当局的跃进指标，做假就成了唯一的“出路”。最常见的做假方法，是把已成熟的庄稼全部移并到一块地

里，应付上级验收，或请来各方领导和媒体“现场收割”，并且常常通过细致的安排重复过称。为防看出破绽，一些地方把还没抽穗扬花的水稻提前移栽到一起，结果全部沤烂在田里。

人民日报，这家代表党中央“喉舌”的权威报纸，自从1957年按中央规定没有及时刊发毛XX的讲话被毛斥为“死人办报”并换了总编辑后，就突然生猛、强悍起来，先是在“反右派”中冲锋陷阵，1958年又引导全国人民在“放卫星”的比赛中一路狂奔：6月11日，河北魏县，2394斤；6月18日，河南高丘县，4412斤；6月21日，河南辉县，4535斤；6月30日，河北安国县，5103斤……7月12日，已放出29颗小麦卫星的河南省又一颗超级卫星升空：西平县和平社亩产7320斤！

当北方小麦产区卫星如云时，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为什么稻谷不能够亩产万斤呢？果然，8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湖

北劳模官木生的“长风社乘长风破万里浪——早稻亩产15000斤”。

中国青年报也不示弱，刊发了钱学森亩产万斤的雄文，并发表社论《我们需要多少就能产多少》，“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粮食？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找到了完全的答案，这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事实证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是无限量的，我们需要多少就能产出多少。”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自此成了放高产卫星的“名言”和“依据”，高产吹牛也节节攀高，牛皮一个比一个厉害。

人人都知道是假的，人人都不敢说破，人人都要参与吹牛还得一个比一个厉害，不然挨整的肯定是你。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在河南挨了批，回北京后又挨整。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组成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联合调查组深入河南等地调查，搞了一个《问题汇编》向中央反映农

村浮夸吹牛瞎折腾及农民深受其害的实际情况，被指为“疯狂反对三面红旗”，负责这件事的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第一副书记邹鲁风，被逼跳湖自杀。

不说假话或说假话的份量不够而挨整，不仅要触及灵魂，更要吃皮肉之苦。那年西充当局在我居家附近召开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逼着大家表态放高产卫星，然后当场揪出报产量最少吹牛皮最小的几个官员，由壮汉打手们扯起四肢脊背向上架在空中，再由与会人等各执组织方事先准备的竹板雨点般一顿暴打。这打法西充俗称“打软板”。打“右派”整“右倾分子”斗“坏分子”开什么斗争会等也常是这打法，当场打死的时有所闻。

浮夸吹牛于是成了人人不得不为、不敢不为的社会风气，人民日报上的“高产卫星”则随之水涨船高：8月22日，安徽省繁昌县亩产43075斤；9月18日，四川郫县亩产82525斤……人民日报上的“高产卫

星”，一直放到广西环江县 130434 斤、河北小站公社 152533 斤。

亩产 13 万斤、15 万斤！想想若把这 10 多万斤稻谷平堆在一亩地上，没有一人高也至少有几十厘米厚吧。难怪毛 XX 一再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忧。

大跃进还有一个好听的叫法：“生产革命和技术革命。”自从毛 XX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大讲破除迷信，又写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后，“卑贱者”们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声浪中恍然大悟，原来“科学”不过如此：科学发明大多是没有文化、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所为。

各种各样吹出来、夸大了的“发明创造”及成果，于是纷纷见诸报端。

北京农业大学培育的“农大黑”母鸡下的蛋一个有三两还多。河南遂平县和兴管理区社员用谷子和高粱嫁接培育出“高粱谷”，穗形像蒲棒，籽粒像谷子，吃起来又甜又黏。山东省园艺科学研究所的王立治将

苹果的幼果，嫁接在正在生长的南瓜上，苹果的果形、色、味和大小都与树上所结无异。山西省解虞县卿头小学六年级学生尚马朝，把番茄与马铃薯嫁接成“两层楼”植物，又把棉花接在向日葵幼苗上，培育出黑色的棉花。

自古以来都是母鸡孵小鸡，而公鸡除了打鸣外既不会下蛋也不会孵鸡娃，然而陕西蒲城县林吉村农业社社员试验由公鸡孵小鸡成功。方法是割去公鸡的生殖器，用两杯酒把它灌醉，让醉鸡去孵小鸡。这样经过三天后，公鸡就不离蛋了，可以一直把小鸡孵出、养大。

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六个学生组成“卫星突击队”，为改善饲料管理方法，搬进猪棚和猪同住，他们最初采用群众创造的割猪的甲状腺、割猪耳和猪尾，继之再割去猪的部分胸腺，这样使猪的日增重量大大提高。试验的结果据报载，“20头猪在5天内平均每头增重6斤半，其中一头最高日增19斤”。

为“解决全面丰收与劳动力不足的尖锐矛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迅速在农村开展农具改良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人人当工匠，户户是工厂”。

北京开办农具革新展览，展出数以千计的“新式农具”，大部分为木制手动，有一人操作的“手动式联合收割机”，有数十人才能启动的巨型人力提灌装置，还有类似永动机一类的玩意儿，整个露天展场犹如中世纪博物馆，一批又一批各级官员和各地代表来这里洞开眼界、激发灵感。

36名“最聪明的”文盲、半文盲被吸收为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会员，据说他们创造的各种人力机械，可提高工效几十倍上百倍，甚至“比畜力高几十倍”。

名气最大的新式农具，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双轮双铧犁。这种带轮子、有前后两个铧刀的全金属结构的家伙，其重型的有300多斤，最轻的也有180多斤。这个傻大粗笨的家伙，当年作为新式农具从东欧引进，在平

原地区很难用，在山区和水田里完全是个劳民伤财的废物，名声奇臭。1956年强行推广160万部，农民大呼上当，纷纷要求“退犁”，但由于毛XX的支持，全国农村都得推广，不然就得以“右倾保守”挨批。大跃进中四川在农村使用后全部厌弃的情况下，又买下强行摊派的40000多具新犁，结果还是废铁一堆，除了偶尔向上级表演外，没有一个农民愿意用。

急于向全国调运粮食的四川省，要求交通运输实现“七化”：农村运输车子化，水上运输机械化，车子胶带化，山区运输驮运化和轨道化，渡口桥梁化，搬运机械化……成都平原的40万部鸡公车，要求将轮子加大，轮上加胶带，轮轴上装弹子盘，还制造出载重一吨的“三轮鸡公车”。

当科学被作为迷信扫荡以后，许多离奇荒诞的“科学发明”纷纷亮相，成为大跃进中的一大奇观，也浪费了无数的人财物力，荒废了工农业生产。如一辆汽车拉几十个拖

车搞“汽车列车化”，全民打滚珠搞“轴承化”的“机械化”。河南吹嘘说，全省七个地区108个县，1958年“基本上做到了县县区区办轴承工业”。浙江发誓在10月底之前，把一切改良农具装上轴承。北京还办起了滚珠轴承展览会。

和“汽车列车化”媲美的一绝是“铁路木轨化”。四川大邑县安仁区雄心勃发，动手修木轨土火车“区环线”，修出一段后，温江地委就去开现场会，于是砍树子方便的地方纷纷效法。邓小平的故乡广安县胃口更大，已动工修建“全川第一条县办铁路”，新华社的报道说，“目前修路的人们正在山岭中架云梯、搭天桥、修路基、架桥涵。他们用矿山的轻便铁轨辅上线路，铁轨不够就用木轨包铁皮的办法架设铁道复线。”

挖坟运动也掀起了高潮。为了平整土地、改造土壤、扩大耕地面积，全国到处“动手把祖先的坟墓翻掘起来”。因为那些棺木和石碑，可以“用来筑桥、铺路、搭瓜棚、

修猪圈，稍微坚固一点的棺木，更是造车轮子的好材料。”到公社化以后，成都平原坟墓林盘里的树木和棺材，几乎全部喂进了炼铁土高炉和公共食堂的大柴灶。

所有对科学的“迷信”扫荡一空，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创奇迹的竞赛一浪高过一浪。农业展览会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王”：树一般的油菜王、棉花王，一窝结几斤谷子的小米王，挂五六个包包的玉米王，头上分叉的麦子王，南瓜般的红苕王，两人抬的南瓜王，半人高的冬瓜王，扁担长的丝瓜王，河马似的肥猪王，硕大无朋的鸡王、鸭王、兔王……

新华社报道：66岁老农把棉花嫁接在椿树上，“有四株已经开始长芽”；有人通过小麦和玉米杂交的办法，培育出在当地一年两熟的小麦……流行的观点是，蕃茄和红薯杂交的品种就会上边结蕃茄下边长红薯，羊和牛杂交羊就会长得和牛一样大，猪和象杂交就会长得和象一样大。却没有人想过或

者想过也不敢说：牛羊杂交后牛是否会变得和羊一样大，象猪杂交后象是否会变得和猪一样大？

“发明创造”高潮迭起、万箭齐发，样样都跟不上“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需要，样样都必须跃进再跃进，畜力不够就来个配种大跃进。

四川日报报道，广安县大良乡齐行一社等四个农业社，“短短十天中生猪由 600 多只增加到 6000 多只，户平达 30 只”。洪雅县将平乡春光三社一只母猪 20 天内连续产仔两窝，头窝 8 只，每头重 8.6 斤，2 窝 8 头，每头重 2.4 斤。可见只要掌握好母猪的排卵期，就可以大大缩短产仔周期，“目前正在推广这种办法。”

人民日报报道，陕西省井泉县出了两个配种女英雄，一个 20 左右，一个年方 25，她们昂首阔步拉着公畜，在县城的集市上找个宽敞的地方一站，认真地从事着配种工作，“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有时

挑战性地环顾一下四周，好象是在探询，倒要听听谁敢说什么。”男人们“惭愧地低下了头”，老封建们吓得吐舌头说：“这两位姑奶奶胆子可真不小啊”。作者赞扬说：“两位姑奶奶”的胆量比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还大，在她们的鼓舞下，“陕西省赵寿山省长也亲自拉种畜配种了。”

四川仁寿县的妇女也不是好惹的，康乐社女社长周文彬为首的七个女青年组织了全县第一个“妇女授精点”，不顾旁人耻笑和家庭责难，搬到牛房住，采取打针、吃药，“公牛诱情”等办法，使11头漂沙牛全部发情配上了种。

沙牛即母牛，漂沙牛就是无生育能力的母牛，只用来出力。要漂沙牛怀孕，如同要骡子下崽。但是仁寿县不信这个邪，在“改造漂沙牛，实现全配县”的呼叫声中，采用“综合性催情、人工授精、早期配、热窝配、多次配和月月配的办法，破除了漂沙牛不能生育的迷信。”

仁寿县委书记杨汝岱、副县长熊俊超在四川日报上介绍《仁寿怎样实现耕牛“全配县”》的经验。县委的口号是：“政治挂帅，书记上阵，搞运动、抓突击，常年配、月月配，叫就配、多次配，人工授精配、改造漂沙牛。”“母牛不配完，运动永不休，全配要全孕，争取上北京。”于是，“一个闪电般的耕牛全配运动轰轰烈烈在全县展开了。”

安岳县的母牛十有八九是漂沙牛，为了让漂沙牛发情，全县办起“催情院”798个，以喂“催情药”、打“催情针”、用公母牛混牧等办法“诱情”，县上还介绍说：“由于种水牛不足，我们打破迷信，大胆用黄公牛与水母牛交配，已配上了22头。”

.....

大跃进中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地压下来。圣上的旨意主宰一切，高层的意志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层层压制，真实的情况一层一层被封锁，各级干部的胡作非为登峰

造极，谁敢不这样做谁敢说真话谁就要挨整还得连累家人亲友，从而使错误的政策越走越远，灾难性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并且注定了这种后果将主要由农民承担。

#### 四 “反瞒产” 逼出大饿毙

中国那场惊煞世界、荒谬绝伦的大跃进，源于“解放后”接连不断的政治打压、运动整人、愚民洗脑及至右派们被一网打尽全民“封口”后，凡是说真话就要挨批挨整，全社会没有了任何反对、制衡力量甚至连杂音都没有了后，一切唯圣上旨意行事的皇权专制。

“大跃进”毁灭天文数字人命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以暴虐的强权、野蛮的打压驱使广大农民和下放的右派分子们持续进行高强度、超极限的强迫劳动，造成严重体力透支又极其缺乏营养补给从而造成生命衰竭的慢性死亡；甚至以打死逼死多少人的暴力手段搜尽农民保命的口粮而又不准逃荒要饭、

互相救助，有的甚至不准上山挖野菜或贴封条封门，被强行限制在村子里活活饿死。

在那个极其苦难的年代，大多数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饥饿和恐惧之中，特别是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年月，广大农村几乎倒退到了2000年前的农奴时代，中国社会俨然成了一个大监狱——严密的户籍制度及疏而不漏的社会控制，剥夺了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自由尤其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人民公社对农民像牲畜一样圈养圈管的集中营式管理加上深入到每个人最私密心灵的思想钳制，哪怕只是一句喊肚子饿的话也可能动辄得咎惹祸上身，抄家、批斗、游街、跪罚、毒打、强制劳动、私设监狱变相劳改，许多农村干部都能随便抓人关人甚至活活打死，严厉限制通讯、言论甚至截留外发的信件封锁死农民同外界的联系，没有权力机构开具的证明休想外出，甚至逃荒要饭也要作为“盲流”、“流窜犯”来抓，一旦发现有农家冒炊烟必遭批斗严惩，像劳改犯一样强迫劳

动、昼夜下苦力还只能翻山越岭到集体食堂喝大锅清汤，稍有不满意或冒犯还要遭受“扣饭”等一系列惩罚……甘肃秦安县一个学生说吃不饱肚子饿，被抓捕判刑劳改八年。河南光山县农民吴德桐饿得受不了说了句不满的话被活活打死。商城县一个姓王的农民饿极偷麦吃，被队长逼着自己把手剁掉；该县观庙南洼大榨屋文小塆一位妇女，被队干部一个倒煤油一个划火柴活活烧死。

尤其是1959年秋至1960年春，在集中打击彭德怀等正直党人的庐山会议后结合“反右倾”进行的“反瞒产私分”，是直接导致农民大规模饿亡的一场极其残忍、血腥的暴力运动，起源于砸锅砍树炼钢铁、吹牛高产放卫星、亿万农民修水利和一拔一拔以迷信扫荡科学的疯狂蛮干造成惨烈的大破坏也造成粮食大减产，上方根据浮夸虚报的高产量进行的高征购和外调粮，无法完成就责怪农民“瞒产私分”拒不交粮。也是毛XX在位27年唯一走上前台亲自抓经济工作所搞的

大跃进中，继一言九鼎主抓公社化、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放高产卫星、办公共食堂等等伟大创举后，为了在吹破牛皮、丢人现眼时搜刮到更多的粮食以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正确、皇上不容置疑的伟大和满足大规模出口之需，所高度关注及亲自督办的一场“面子保卫战”。

尽管谁都知道，“高产卫星”是由上至下层层放大逼出来的，各地的粮食“大丰收”也是逼出来的，但上方按地方虚报的高产量搞高征购却毫不含糊。没有实际产量的高征购极其困难，毛就指责农民私藏粮食“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亲自起草了中央“反瞒产私分”文件，下令“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还挖苦嘲笑“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事实上那时农民的生活正在以一天等于

二十年加速下滑，个人做饭属于违法，只有公共食堂的大锅清汤保命，所谓“瞒产私分”纯属子虚乌有，可被一次次政治运动整怕了的各级干部谁也不敢说真话。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层层加码施压下，一时间全国乡村到处是“逼粮会”，“反瞒产私分”竟至演变成了强制征粮、逐家搜粮、拆房掘地找粮，随意捆、绑、打、吊农民，以赤裸裸的酷刑强行从饥民口中夺粮的一场疯狂的暴力运动。

为了逼粮，河南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一连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并致死一人。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 13 个孤儿被赶到山上冻死。在潢川县委召开的逼粮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被打者一人当场死亡，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甘肃通渭县陇阳公社书记李生荣逼粮中打过 53 人，打死逼死 12 人。四川荣经县调动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挨家搜粮，有妇女被吊起来脱下裤子

抽打下身，一些人被活活打死。

正如信阳地区一位老干部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16个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

“反瞒产”是大跃进中最暴虐、凶残的一幕，从1959年秋冬至1960年春，时间跨度约半年，为大饥荒中饿死、打死人最多最集中的时期，有史家称其为“饥荒大爆发”，全国几千万饿殍中超过半数（约60-70%）死于这半年。

1960年，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露馅后，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向省委第一书记、河南左王吴芝圃报告，在反瞒产私分中为向农民逼粮，光山县槐店公社即有3528人被打，包括231名涉嫌瞒产或右倾的干部，当场打死558人，打后死亡636人，致残141人，逼死14人。打人方法除一般的拳打脚踢、

捆绑吊打外，还使用了拔头发、割耳朵、竹签穿手、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捅阴道、活埋等数十种酷刑。

据中共信阳地委监委的报告：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委员亲手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光山县陈湾小队社员陈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先后死亡，家里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致死，徐一家6人随后全部饿死；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同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遭到残酷毒打致死；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其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姜湾

一个村原有 45 人，死亡 44 人，剩下一个 60 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潢川县桃林公社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自己死后儿子没人管，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后自己死去。

另据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张树藩秘书余德鸿记述：光山县饿死这么多人，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 100 多人。

各级干部为了完成根本无法完成的高征购（有的征购量甚至高于总产量，农民不吃饭不留种子全部上交也不够）或外调粮而昧着良心残害农民，源于对政治高压的恐惧和对身家性命的自保，以及大搞整人的运动造成的人性沦丧和极度残忍。1959 年庐山会议后，一场“反右倾”运动横扫全国，一举打了 300 多万“右倾分子”——大多是不愿从农民口中夺粮、相对心软的干部。邓小平 1962

年5月说这次运动被整的“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从而挟持党人们将已经造成惨重灾难的大饥荒进一步推向恐怖的高潮，种种令人发指、禽兽不如的暴行，终于把农民们保命的口粮搜刮一空，集体食堂也普遍停伙。河南唐河县还扒出农民棉被、棉衣、棉裤里的老棉花，来完成棉花征购任务。

地狱的大门打开了，恐怖的死神大张着双翼扑向束手待毙的广大农民，许多农村开始了成批成片的大规模死亡，多少社队十室九空，多少家庭死绝断户，神州大地鬼哭狼嚎，许多地方呈现出难以思议的末日惨景。

全国最先创办人民公社也最先曝出大规模非正常死人的信阳地区，以活活打死、逼死8万多人（其中打死6.7万人）的暴行，将农民活命的口粮收缴殆尽，不长时间即饿死100多万人。据河南大饥荒研究者李素立“死绝村”调查披露的史料，“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死绝5万多户，村

庄毁灭 1 万多个”；“仅息县就有 639 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 400 多个”；商城县“死绝村庄 453 个”。其中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饿毙。另据 1960 年 6 月中央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信阳潢川县死亡人口中，青壮年占 54.7%，固始县死亡人口青壮年占 67.9%，淮滨县六大队死亡的 1464 人当中，劳动力占 54.2%。

贵州湄潭县在 1959 年 9 月到 1960 年 4 月的反瞒产逼粮中，使用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酷刑，活活打死 1324 人，关押致死 200 余人，对干部戴上右倾帽子撤职并开除公职 1680 人，导致一年多时间饿死 12.5 万人（不含正常死亡 1 万多人），死绝 3000 余户。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录生当年受命对遵义各县所做的人口汇总，遵义地区总人口 1957 年底 370 多万，1961 年 310 余万，短短三年人间蒸发了 60 多万人。

甘肃通渭县提出“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口号，组织人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找粮，把反瞒产私分搞成令人恐怖的一连串运动，使用酷刑 120 余种，批斗农民 10000 余人、生产队长以上干部 1169 人，以公社为单位集中劳改 1637 人。逼粮过程中，马营公社架起 12 挺机枪开斗争大会，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拷打群众 160 多人，当场打死 4 人，绑送劳改 66 人。年仅 35 岁的县长田步霄到农村调查后说了真话，主张放农民一条活路，被打成反党分子“小彭德怀”整死。全县搜刮农民“瞒产私分”的保命粮 1100 万斤，致使三分之一的人饿死。鸡川镇东坡生产队几乎全部饿死，院子里全是死人没人埋，草都从骨头堆里长了出来。

甘肃大批农民逃到省会兰州要饭，很多人饿死在大街小巷、火车站，兰化、兰炼两大厂每天都要派出五六辆卡车去收尸。通渭县鸡川镇张锡珍回忆，当年拉着架子车到定

西火车站后面丢死人，看到从沟口脚下到里面都是死人，男男女女，满满一沟，让野兽吃的半截子、胳膊、腿、烂衣服、烂被子，好大一个死人坑，就和电视上的南京大屠杀一样。另据大饥荒调查者依娃（美籍华人）记述：通渭县大牛沟大队党支部书记强拉辖下 16 至 18 岁的三个未婚姑娘陪睡，并把不从的姑娘扒光衣服吊在房梁上，用擀面杖撑开姑娘的双腿，往阴道塞粗草绳再猛然拉出来，反复多次，折磨致死。

山东省饿殍遍野，尸横村巷，原省长赵健民称仅惠民地区（现滨州市）就饿死 60 万人。早在 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济宁地区就发生严重饥荒，农民挖麦苗、剥树皮充饥，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达 67 万多人，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1959 年 4 月，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在济宁地区调查时，给第一书记舒同——一位反右和大跃进都左得可爱的书法大家写信，谈到造成饥荒和死人的一些原因：很多地方将农民的

粮、草、菜、锅等强行收缴归公；巨野、郓城县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各县都实行移村并村，大量村庄和民房毁灭……郓城县樊作运说，潘庄刘学进的女儿饿死后，为多领一个人的饭，刘家把小孩尸体捂在被窝里好多天，从他家门口经过臭味熏人。另据《往事微痕》引述：山东金乡县胡集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将饿死的儿子煮食，夫妻俩和女儿围着肉盆落泪，支书抹着鼻涕眼泪动员妻女：我当大队支书都敢吃，你们怕啥？吃饱了就是立即拉出去枪毙，也比饿死强。

当年在曹操故里——安徽亳县（现亳州市谯城区）政府办公室和县委生活办公室主持工作的梁志远据工作笔记与活页记录推算，亳县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在20万人以上，有近3万户彻底毁灭。1960年底，他带人在亳县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大王支庙等六个村庄，这里127户、575人中两年饿死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2%，死绝18户，占

原有户数的 14%。在五马公社泗合大队杨庄调查，这里原有 68 人，除 4 人外流全庄仅剩 18 人，两年饿死 46 人，死亡率达 70%。十八里公社羊庙大队幼儿园收养的 11 个孤儿饿死了 10 个。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披露，1958 年凤阳县人口 402700 人，1961 年下降到 245262 人，短短三年净减员 157438 人，饿死者占总人口 39% 以上；全县死绝的人家 2404 户，消失村庄 27 个。改开之初按手印立生死文书率先搞承包的凤阳县小岗村，从 1959 年起共有 60 人饿死，6 户死绝，71 人逃荒要饭，到 1962 年春全村仅剩下 10 户 39 口人。原国家统计局干部杨德春记载：“安徽省太和县官集区赵寺大队，1959 年冬至 1960 年夏……全大队共死亡 1709 人，占原有人口的 36.3%，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 41%。”另据管怀伦《肥东县大李大队 1960 年饥荒调查》，该大队 12 个生产队灾前 180 户 868 人，381 人在大饥荒中死去，其中 22 户死绝。

湖南澧县县委 1960 年 6 月上报文件中称：在反瞒产逼粮运动中全县农村干部摧残群众的手段非常毒辣，使用了吃屎喝尿、吊半边猪、针穿嘴巴、棍穿阴部、坐水牢、火烧、拔牙齿、滚雪球、逼女人赤身裸体、男女互咬生殖器、拔胡子、扯头发、吊鸭儿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挂屎桶、跪碎瓦渣、剁指头等 40 多种酷刑。有的地方在抄家中还普遍采取连抄家带拆屋、抄后封门、扫地出门等。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先后体罚群众 90268 人，扣饭 68868 人，打死 384 人，因打自杀 301 人，扣饭饿死 350 人，打残 1813 人，因干部作风问题外逃 15996 人。有的一个人就打过 340 多人，打死 15 人。澧阳公社荷塘大队干部潘启才规定打死人后不准家属收尸、不准哭灵、不准买棺材，甚至还强迫死者家属笑。

活活饿死、打死、逼死那么多人，难道真没有救命的粮食吗？

毛时代国家征购的粮食都存放在各地的

仓库里，但地方只能保管不能动用，只有中央才有权调配，因而许多地方宁可让老百姓眼瞅着粮仓里睡大觉的粮食而饿死，也不敢开仓放粮拯救灾民，这是以前历朝历代都没有的事。大饥荒中贵州江口县将近一半的老百姓饿死，几个公社书记带头抢粮库救命，擅自开仓放粮的江口县长在当局重兵镇压时饮弹自尽，虚报产量高征购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而死。四川古蔺县某粮站站长邹英杰不忍心村民被活活饿死，私自开仓分发一些粮食救济灾民被判处无期徒刑，文革中加判为死刑立即执行。

甘肃通渭县今寺子赵家山当年任大队干部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村里已死人过半，可是生产队的仓里还有几十斤油渣、几十斤粮食，就是不敢分给社员吃。省委工作组来村查访时问：人都饿死了，为什么不把它分给社员吃？我们无言答对，心里却明白：谁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当时和政县、通渭县庄稼正长着上方就不断催粮逼

粮，人们无奈把未成熟的青粮割下来在锅里炒干上交，把没成熟的苞谷在炕上烤干交公粮，这么一糟蹋自己就更没有吃的了，有人藏在枕芯里的荞麦皮和裤裆里的谷子面也被搜走。有人晚上在仓房里打了11只老鼠，煮熟后全部吃掉。一个叫赵由素家的人天亮时一看，炕上死了一大片，一夜就饿死了5人。通渭县有个叫曹玉州的，把5个娃娃都吃完了，还把衣服剥下来卖了换东西吃。

河南信阳是向农民暴力逼粮最残忍、活活打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但当时信阳国库全是满仓，存粮多达11亿斤，如拿出其中的五分之一救济灾民，信阳饿死的100多万人全都可以活下来。当年任职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的张树藩，一位主动发放救济粮救了无数信阳人的命而被打成右倾分子受到残酷迫害，最终冒险揭开信阳惨案黑幕避免了饿死更多老百姓的正直党人，去世前留下了一段催人泪下的遗言：“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

库都是满满的。但民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老百姓为什么饿死不敢抢粮呢？因为谁都知道若抢国库难免一死，而且还要祸及子孙后代，没死的全都成了反革命亲属。

另有资料披露，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 12 个月，国家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至少有 403 亿斤，按当时的吃粮标准，至少相当于一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按历史上最常见的开仓放粮救灾，绝不会有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当年信阳饥民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据说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

曾任张树藩秘书的余德鸿回忆：1959 年……到了农历 10 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 6 具尸体，回到离我家 5 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 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 100 多具尸体。外面

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余德鸿曾在其家乡淮滨县工作多年，任过副县长等职，他说淮滨县当年50万人，饿死的人不少于30%。该县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任宽回忆，防胡公社5万人左右，共饿死2.2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余德鸿家乡大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52%。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人家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有400多人，饿死了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107人，其中死绝6户。……总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淮滨县防胡乡余文海回忆：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3个孩子，高鸿文到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3个小孩全都煮了吃了。

刚刚经过“民主改革”的西藏，也在大跃进中遭了殃。亲共的班禅喇嘛1962年写下70000字长信，向周恩来反映西藏遭受的灾

难，包括：“收购过头……对大多数家户，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有些地方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毛XX阅后勃然大怒，不久，班禅喇嘛遭受批判，1968年投入秦城监狱，1977年方才获释。

## 五 酷刑打压，索命罗网

1958年11月21日，毛XX对中共高层讲：大跃进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大炼钢铁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并大讲死人“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人死应开庆祝会”，“死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解放后”最早提出、应用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

学家，被誉为“毛时代唯一的思想家”顾准，甚至认为发动大跃进是一场有预谋的人口灭绝，他在1959年11月亲历农村苦难时的日记中写道：“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

郑州大饥荒研究者郑兢业向笔者提供了他收集、整理的一系列大饥荒资料（本文有若干引用），包括河南商城县档案馆收藏的1961年1月县委整风办公室成文的一份基层干部以酷刑残害农民的45个案例——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治保主任彭启民称社员陈祖更、徐正舟杀牛吃，把他们拉到大队部扒光衣服捆绑起来，架上干柴活活烧死；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中队长蔡文清把因没饭吃而杀猪的社员蔡德宇弄到大队，用锄头猛打其脑门致头破血流当场丧命；余巢公社马糟大队长×瑞江令人将社员雷显生衣服剥光抬起来摔掼，并用火剪把耳朵夹掉，活活折磨死；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副支书把社员范守琴的嘴用大针粗线缝起来，缝的鲜血直流，伤重

而死；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有个孕妇落月时因没饭吃骂了一句，大队支书王克干马上在竹园里砍一根竹子，弄成弯弓形插在孕妇嘴里将嘴撕成两半；钟铺公社三教河大队支书阮永安把雇农余培×15岁的儿子用称钩子从嘴里勾进去，从鼻孔里兜出来，当场钩死；上石桥公社一姓潘的社员被大队支书刘炳荣将两个大拇指拴在一起，吊了一天一夜，连吊带打致死；城关公社新华大队妇女主任梁秀英把一社员拉到大队斗争，逼迫两人抬起头朝下摔死；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支书徐荣品把社员谢昌玉拉到厕所逼迫吃了一堆屎，谢于次日死去；上石桥公社干部李长彬派两个民兵把老社员胡学信手脚捆在一起，用杠子抬着跑路致死；余集公社雷冲大队治保股长刘义民把社员花某等三人的耳朵用大针扎通，用麻线串在一起拴在牛尾巴上任牛甩动折磨，当场整死一人；上石桥公社中队长马成良把社员岳德雨衣服剥光五花大绑，推在外面淋雨带冻而死；县工会主席朱德田在上

石桥公社张畎大队把一个偷了点菜的小孩衣服扒光，推在雪坑里冻死；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副队长陈恩建将身患浮肿病的贫农社员万忠文抬到山上，用锄头猛砸头部，接着埋掉；钟铺公社平塘大队队长李奠忠把两个摘豌豆的小学生拉到山上挖坑活埋，幸被人发现而得救；达权店公社前湾大队队长石大喜在食堂打饭时，12岁小学生吴长先扒在缸边拾了几粒饭吃，石即将小学生两腿提起头朝下塞在稀饭缸里活活烫死……

一个普普通通的县，短短时间即发生一系列丧心病狂残害农民的惨案，足见中国的大跃进已搞到了何等残忍、血腥、惨绝人寰的程度！

为了高举“三面红旗”，全国公安也搞起了杀、关、管、斗的大跃进。北京提出要把政治和治安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成都一个派出所宣称一天破了一万件案子。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披露，安徽1957年逮捕8000多人，1958年中央下达给

安徽捕人指标 45000 人，全省实际逮捕 10 万多人，逮捕人数同比上一年猛增 10 倍。1960 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层层揪右倾分子、抓“小彭德怀”，安徽又一举逮捕 50000 多人。

尹曙生说逮捕的人大多是无辜的百姓，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等说了牢骚话，或为了活命吃青、分吃生产队的粮食，或外出逃荒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这些被拘捕的人员有近三分之一（31%）惨死在关押场所。

尤其是在反瞒产的暴力运动中，往往都有公安上阵甚至动用武装力量。信阳地区为向农民逼粮，仅由公安机关出面正式拘捕的即达 21000 多人，其中 800 多人死于关押。1959 年 9 月 17 日，遵义地委在湄潭县绥阳公社召开“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现场会，当地抓到 48 名饥民关押在供销社一间仓库里，除一名小瘦子晚上从铰链锁的门缝挤出逃生外，其余 47 人全被活活饿死在仓库。后

来为捂盖子又把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押，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 36 人，并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附近两个大消洞里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没断气的扔下去还在哇哇大叫。

大跃进年月种种惨无人道、疏而不漏的强力打压和穷尽古今的严密社会控制，强迫进行高强度、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加上食不裹腹的强烈饥饿，种种丧尽天良、视人命如草芥的践踏人权和犹如集中营的关押，如同天罗地网一样堵死了农民们以自救、互救苦海逃生的所有渠道——“反右派”封住了党外人士的嘴，“反右倾”封住了党内干部的嘴，没有人再敢对毛 XX 统领各级官员的胡作非为说一个“不”字，一场空前绝后的人为大饥荒从而毫无阻力地登场了——浮夸风、共产风、高征购搞得农民们一无所有；大举施暴的“反瞒产私分”抢光了农民们保命的最后一点口粮；搞公共食堂不准自己做饭吃变相剥夺了农民们吃饭的权利；城乡各方严

防死守不准逃荒要饭堵死了农民们逃命的最后一条出路……

这种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的极权严管、暴力打压，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可怕后果。不少农村摆在莘莘百姓面前的就只剩下了两条“出路”：不是打死就是饿死！许多农村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草根吃光了，畜粪、死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别人的呕吐物或排泄物，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1959年冬，河南淮滨县一个与邻村订婚的姑娘饿得站不起来，爬到未婚夫家想讨口吃的，不料饿疯的未婚夫用裤带把她勒死后煮吃。江苏宜兴县铜峰公社黄童大队卢洪生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把内脏挖出来吃。

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回忆大饥荒中他和许多同学把煤炭当美食享用，小伙伴们和老师拿着煤块咯嘣咯嘣塞进嘴里嚼，以及乡亲们饿得吃泥土的情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

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后来听说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活活憋死了好多人。”

军事评论员张召忠将军回忆其家乡河北盐山县大跃进年间树叶都吃光了，村里每天都有人饿死，他为填肚子甚至捡来别人扔掉的光骨头用斧头砸成碎渣当肉吃。当年西充当局召开三级干部会犒赏了一顿肉骨头稀饭，与会者们竞相争食，未及啃尽的骨头扔了一地，居民们闻讯纷纷抢食，住在附近的外婆前往捡了一筐，送家洗净再煮后让我美餐了一顿。

河南胡山林回忆 1959 年下半年到 1960 年上半年方城县施庄村农民们争相抢吃大雁屎及大批饿死人的情形。他说村里每死一个人，自己都要用硬物在床边的墙上划一道痕，到第二年麦子灌浆时数那些道道，全村 196 人共死掉了 54 口。《河南大饥荒幸存者访问记》记载，依袍是个力气大饭量大的男

人，饿得躺在床上不能动了，那天他侄儿在外间听见里边咯咯吱吱响，进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帮木头。他侄儿惊问你这是干啥啊，依袍说我啃点花生饼吃吃，结果就这么啃着床帮饿死了。

1957年在云南屏边县划为右派分子的李斌，回顾了大跃进期间在红河州劳教所“改造”时，所经历的一些残酷整人和饥饿夺命的人间地狱惨景——

为配合社会上开展的各种运动，劳教当局总是用大肆斗人、打人及逮捕人来制造恐怖气氛。红河州劳教所被逮捕的劳教人员中，有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吃食物的，有锄草不小心锄断禾苗或走路摔了跤将水桶摔坏的，有实在太累太困倒在地上起不来而被认为是抗拒改造的……漂亮女大学生右派肖×，难以容忍管教人员黄×的漫骂和性侮辱，要求他说话干净点，黄立即暴跳如雷，指着肖×的脑门大骂：“什么干净不干净？你妈的B，烂婆娘，你还敢这样对老子讲话？”

老子今天就抹抹鸡巴甩你两巴掌！”接着“叭”的一掌，重重打在肖×的脸上；然后汇报上去，劳教所立即召开现场会对肖进行批斗、打骂，直到肖女晕倒在地，全身痉挛。经多日反复折磨，致肖神经失常，劳教所却说她装疯，组织一些人随心所欲地对其拳打脚踢，捆绑吊打，还把她悬空吊起荡秋千，继之又将她逮捕“法办”。已经神志不清的肖×在宣布逮捕她的大会上，还对着提绳子来抓她的公安人员傻笑，直到被绳索紧绑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劳教当局采取各种扭曲人性、泯灭良知的手段，迫使劳教人员就范。一位来自机关的大个子劳教右派饿得患了水肿病，体重从100公斤垮到30几公斤，饿得实在受不了到食堂偷吃了一些冷饭，被带上20多公斤的大脚镣，关在仅有一米见方的一个地洞——劳教所特设的“禁闭室”里，既抬不起头，也伸不开脚，每天收工回来只能像狗一样蜷缩在里面。另有两个劳教人员被关在一个狭小

的地下室活活饿死，后死的一个竟将那已经发臭的先死者屁股上的肉啃吃了许多，嘴中还含着一口没有咽下去的人肉。

李斌回忆，在大跃进大干苦战的漫长劳役中，最悲惨的是严重饥饿的煎熬与折磨。每天临近早、晚两餐饭前，都会有人当场倒下，昏死过去。一个严重水肿病患者已经起不了床，管教干部硬说他要死皮，强行将他拖起来出工，结果拖到路上便断了气。有一次我们奉命去抬埋一个天亮前就已经硬在床上的死者，邻床的一个病人还向我们讲了死者临终前的一些情况，而当我们把死者抬出去埋了回来，向我们讲死者情况的那个病人又成了死者……最先死的还有一口用床板拼成的“棺材”，后来死的多了，谁死了就用谁的被子、垫单包裹着，抬出去“软埋”了之。

一时尚未死去的 90%以上都得了水肿病，临近死亡仍被强制劳动，只要风稍大一点就有人被吹倒，再也爬不起来。为活命甚

至有人吃粪便和别人的呕吐物。有一个水肿病患者已经病得不省人事，意外得到一碗救命的红糖稀饭，却因病重和干瘪的肠胃无法承受，“哇”地一声吐了出来，邻床的一个病人立即挣扎起来，趴在地上，用手将那堆呕吐物一把把抓起喂进自己嘴中。

被饥饿驱赶到死亡边缘的右派们，哪怕是掉在路上的一片黄菜叶，雨水中泡得发胀的皮条，食堂丢在粪草堆上的一个烂红薯，或是侥幸抓到一只老鼠、什么虫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放进嘴中吃了。一位出身书香门第的万××，被饿得几次昏死过去，一天在出工的路上碰见一条正在爬进石缝的麻蛇，立即上前一把逮住蛇尾巴，竭尽全力往外拽，只听“咔嚓”一声，麻蛇被拦腰扯断，万××立即将那截血淋淋的麻蛇尾巴放进嘴里嚼起来……

香港大学历史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一位出版了9部中国现代史专著的荷兰学者，说他在查阅内地档案写作《毛

XX 的大饥荒》（英文书名《毛的大饥荒》）一书时，有三个意外的惊人发现——大跃进时期频繁滥用酷刑，包括对孕妇和儿童；很多人不是直接饿死的而是由于被强制剥夺了吃饭的权利而饿死的；一切灾难是由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发动并导致人民的道德堕落。

冯客从研究分析解密的档案资料发现，大跃进期间的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无处不在，活生生把人民推入了死亡的绝境。他推算大饥荒罹难者不少于 4500 万，其中 6-8% 的人即至少 200-300 万人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河南新县白雀园的逼粮现场会上，一名大队干部报不出交粮数字被用五匹马套住四肢和头部，当场实施了古代酷刑“五马分尸”。光山县收割庄稼时多人被指偷吃麦粒遭毒打，一个寡妇连同孩子们一起被活埋；一个叫吴德荣的农民说了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被斗、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熊湾生产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

打并撕掉其耳朵，很快即死亡；该队张芝英交不出粮食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其当场死亡，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商城县何店公社官畈大队生产队长涂×荣把一个妇女衣服裤子扒掉，用松枝扎阴道，扎开后撒上青灰，再扎再撒，活活折磨致死。湖南一个农民被逼着活埋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吃，接着这位活埋孩子的父亲因极度伤心而死。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嵒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老头饿极偷杀了一只羊，被捆起来游街示众后吊在树上，老头不停惨叫求饶，没人理睬，直至死去；袁庄大队饲养员刘志兰、袁志红饿极弄死了一头小猪崽吃，被生产队长发现后开会批斗，活活打死；李尧大队饲养员宋和偷食了一只死母猪，大队长翟某带人把他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吊起毒打后游街示众，直至倒地而死。

1959年11月，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大队黄西店小食堂停伙两个月了，全队社员为了活命，共同商议把本队一头牛杀了分吃，大队

干部发觉后率领打手队，把 17 名参与杀牛的社员绑到大队部吊起来毒打一整天，其中 6 人被活活打死。

许多地方就是以惨无人道的酷刑打压，织就了草菅人命的天罗地网，使得广大饥民逃无可逃，只有死路一条。

广西环江县 1958 年 9 月放出水稻亩产 13 万斤的“粮食卫星”（可能是人民日报上最大的高产“卫星”），10 月又放出日产万吨的“钢铁卫星”。在环江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中，武装收粮队荷枪实弹挨户抄家，没粮或不交粮就把人捆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打人的手法五花八门——反手背吊：双手反过背去五花大绑，吊上屋梁；倒挂金钟：用绳子捆紧两脚大拇趾，悬挂上房；吊死猪：称钩穿进肩胛骨，吊在树上；用马刀在人身上一块块割肉，问一句割一刀；耳朵中塞炮仗，不交粮就点火燃爆……环江龙岩公社粮管所干部抓到一个饿急偷粮的 12 岁小学生，决定就地枪毙，杀一儆百。小学生在枪口下

苦苦哀求饶命，哭喊声撕心裂肺。因枪枝老旧，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枪机才打响，小孩鲜血四溅，不治而亡。吉祥公社北宗大队捉到一个偷粮的小孩，毒打一顿后关进密不透风的仓库里，待其父母闻讯赶来时，这个饿得皮包骨头、打得血肉横飞的小孩，早已被活活闷死。

另据 1961 年春中共中央会同湖南省地县四级联手对湘潭县的调查，湘潭县被打的老百姓达 34466 人，当场打死 52 人，打后死亡 549 人，扣饭饿死 400 多人，打后自杀 125 人，被打致残 332 人，打后流产的妇女 187 人，因被打和扣饭外逃 12676 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似乎也没享受到多少浩荡皇恩，但 1960 年耗资一个多亿修建滴水洞行宫，还是为伟人家乡的 GDP 做出了贡献。若把建滴水洞行宫的钱用于救济湖南省饿死的 200 多万人，他们全都可以活下来……

全国以右派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在“大跃进”中的命运都极其凄惨。据著名“五七

战士”铁流等的著述，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北京清河农场、青海湖农场、四川沙坪农场、甘肃夹边沟农场等臭名昭著的劳教农场，都成了右派们遭受惊人磨难的死亡集中营。位于辽宁锦州的一个煤矿劳改大队，1200名犯人在大饥荒中几乎死绝。青海劳改农场大饥荒中死亡4000多人就有3000多名右派，其中1000多名女性。1958年4月15日组建的以右派为主的四川省公安厅“415劳改筑路支队”，因饿死、累死、工伤、自杀、处决、判刑及逃亡失踪等大量减员，到文革前解散时全队5000多人仅有2000多人回归社会。

大跃进年间在河南万胜山林场“改造”的200多名右派，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死的超过半数。1959年冬季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林场基建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强迫每人往返三趟（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就批斗、扣饭（第二天不准吃饭），当晚摔死、冻死、投水自杀死的右派即有17人。

在美国大骂美国出兵朝鲜的董时光博士，满怀爱国之情于1955年回国效力，在“帮党整风”中因给其任教的西南师范学院党委提了意见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劳改，1960年在服苦役中因极度饥饿去捡马粪中没有消化的胡豆吃，被诬为偷吃马粮遭活活打死。

大饥荒年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等。有了严厉管制“盲流”的尚方宝剑，各地大小官员更加有恃无恐。据大饥荒调查者杨继绳披露：当年仅信阳邮电局就奉命扣压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件；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反映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全力追查写这封信的人；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血书求助，结果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

另据安徽亳县梁志远回忆，该县不让饥

民外出讨饭，县、公社、大队遍设“劝阻站”，阻止饥民外出逃荒。劝阻站星罗棋布，村头、路口、车站、码头，都有劝阻站的人站岗放哨，此外还有流动岗哨。劝阻人员对过往行人和企图外出农民盘查、搜身、扣留、打骂、捆绑、关押。过往行人带有食物一律没收，连青菜也属查禁之列。甘肃秦安县城关乡刘春花回忆，她家 1958 年房子遭收走了，一家人被扫地出门，1961 年她不到 14 岁被大队长强娶为儿媳妇，其父才不再挨斗，并可在附近村庄讨饭了。

信阳位于铁路大动脉京广线上，为了防止饥民逃荒或外出走漏消息，信阳南北两个火车站都严防死守，各县城四门均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汽车站由警察守护，对司机也有堵截“盲流”的特别要求；各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进行拷打并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堵截外流人员 19 万人，致收容人员

大量死亡。潢川县设立收容所 67 处，收容外逃人员 9330 人，均遭到审讯、毒打、饿饭、强制劳动，致死致残 2195 人。其中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组织 10 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春，共殴打来往社员 40 多人，其中打死 12 人，并剥掉了 195 人的衣服。商城县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戴云霞、福利厂厂长张青山为主设立的收容所，内设剥人厅、落魂厅，凡被扣押的群众都弄到剥人厅剥光衣服进行斗争，快死的则抬到落魂厅进行冻饿，并采取鲤鱼扣腮、猪啃蹄、鸭子浮水、大针扎等手段残害群众，其间共收容 2900 多人，致死 120 多人。

1960 年 6 月，李先念来到他战斗过多年的鄂豫皖根据地信阳地区调研，看到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丧。面对生灵涂炭的革命老区，他无限感伤，多次落泪。2004 年，饿死、打死、逼死 25 万人的光山大饥荒幸存者吴永宽在村里自费立碑，记载“反瞒产”把农民逼入绝境后，他

所在的 120 人小村庄（生产队）1959 年初冬半个多月就饿死 70 多人。他将收集到的本村 73 位罹难者名字刻在碑上，附上说明，成为了全国数千万饿殍唯一的纪念碑。

## 六 厚赠外邦，饿死家奴

著名女作家章诒和讲到一个心酸的故事：一位登门拜访的安徽作家带来一卷图纸，说自己要写的内容就在里面。图纸铺开是一幅农家村落平面图，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间，每个房间都填有一二人、二三人姓名。安徽作家说这是 1958 年他的一个几十口人的大家庭，他逐一指着说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母住的，哪间是伯父婶娘，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抽出第二张、第三张图，分别是 1959 年、1960 年的。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标注的姓名却越来越少，最后一张图除了一间小屋有一个人的姓名外，其他房间全成了空白，因为都在大饥荒中死光了，那唯一剩下

的名字，就是侥幸活出来的他自己。

中国发生如此惨烈的大饥荒，照理上层领导应当带头节约开支、杜绝挥霍浪费并压缩对外援助，以便共克时艰、顺利度过国之难，尽量减少对人民的伤害。岂料饿死人最多的几年，既是国内为毛 XX 等中央领导修建行宫式别墅最频繁的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猛增养“白眼狼”也最多的时期。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记载：1959 年中国征购粮食 674 万吨，出口粮食 415.75 万吨。1960 年征购粮食 510 万吨，出口粮食 272.04 万吨。饿死人最多的三年出口粮食超过了以前多年出口粮食的总和。

期间许多仓库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甚至有大量烂掉的情况，却还要以极其残忍的手段从农民口中夺粮，然后大量援助许多日子过得比中国好的国家，甚至出口粮食换回稀缺的外汇后再购买西方机器去大搞援外，以期“贿赂”一个世界领袖的名份。以致最惨烈的三年大饥荒中仅在饿死人

最多的 1960 年，中国就援助朝鲜纺织厂、轴承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厂等 29 个成套项目，提供有去无回的 4 亿多元贷款并无偿送给朝鲜 23 万吨粮食（当年朝鲜人的生活比中国好得多）；后来又停止北京地铁建设搬过去修建平壤地铁，把刚刚建好还没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全套设备拆掉运到朝鲜援建新厂，并将仙境般的长白山天池（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之源）的一大半及邻近的几座主峰送给了朝鲜，还把原本全部属于中国领土的鸭绿江一分为二，将邻近朝鲜的一半白白割让给了朝鲜。

大跃进中不顾人民死活对外“大撒币”，搞到了丧心病狂、骇人听闻的地步。1960 年中国分别向非洲的刚果、加纳等提供小麦、大米各 10000 吨的无偿援助，同时应埃及对以色列开战的要求提供援助。那些年援助仅有 200 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就达 100 多亿元，阿国人均获援 5000 多元（那时中国

大陆极难找出拥有 5000 元钱的巨富；许多农民苦干一天的工分才值几分钱）；援建化肥厂人家看不上中国货，就专门从意大利购买全套设备送过去，结果阿国堆在野外任凭风吹雨打、锈蚀烂掉，仅管这是以大量饿死中国人为代价送给他们的。中国大炼钢铁把上好的金属用品如门箱的铁环、扣子，铁锅铁铲、农具甚至妇女头上的发夹、宝贵的金属文物等等投入土高炉炼成废铁，却把最好的自己也最紧缺的优质钢材和水泥等大量送给阿尔巴尼亚，阿国生产建设用不完就遍地建领袖雕像、修地堡工事。如此弹丸小国就建了几千座雕塑、13000 多座钢筋水泥地堡。

原外经部部长李强回忆，大饥荒中国人饿得尸横遍野时，中央却下令购买加拿大小麦后正航行在大西洋的轮船，转向开往阿尔巴尼亚。

那些年对越南的各类援助更是高达 200 多亿美元，仅在大饥荒末的 1962 年，就再次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 230 个步兵营的武

器。乃至翻脸后越南用来打中国人的武器大多还是“中国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字则是“中粮”。“血染的风采”竟然是越南用中国赠送的枪炮染红的！而1957年毛XX将海南岛和越南中间的白龙尾岛——浩瀚南海中最大的一个岛屿主动送给越南，更使中国丧失了大片海域并使南海争端雪上加霜，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勘定的表示南海疆域的11段线，也因之变成了残缺的9段线。

长期打肿脸充胖子慷慨施舍，大肆贿赂收买妄图当第三世界领袖，乃至在中国援助的100多个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但借出去的债是不用还的。毛的“乐善好施”引得全世界都来中国“吃皇粮”，甚至有人仅凭戴了一枚毛像章取悦于毛就可以一次要走几千万，几个骗子胡乱打个外国政党的招牌就能长期找中国要吃要喝要“活动经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几个小兄弟向中国要东西，更是像爷爷向孙子要东西一样理直气壮，甚至“你们有的我们要有，你们没有的

我们也要有”（没有就从西方买来送）。

1950年建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承认蒙古独立并答应全方位援助，不久即派出上万名工人为蒙古建学校、疗养院、招待所、各类工厂甚至还帮助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索要的纺织厂设备，就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大饥荒年间东德向中国索要大量肉食品援助的理由，竟然是东德还没有达到西德每人每年吃80公斤肉的标准，尽管中国城市居民（别说毫无保障的农民）即使在大饥荒结束经济好转后，才勉强达到每人每年三四公斤肉的供应标准。继之又于1961年3月送给东德23000吨大豆，使得东德一度取消食品配给制度。

同时断然拒绝日本的战争赔偿，一口回绝美苏等国出于人道主义的粮食援助。当时苏联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以度荒，却被毛一口回绝：“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他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仅管

苏方鉴于中国的大饥荒主动提出推迟还债或减免债务，毛却坚持将协定16年还清的苏联债务提前到5年还清，敦促国内把大量粮油肉蛋源源不断运到苏联加速抵债，在中苏边境还发生过苏联硬不要中国却硬要给而发生冲突的怪事，因为头顶“大救星”光环的毛XX坚持要争一口气，并因此成全了“苏修逼债”的史话。

另据当年驻波兰大使回忆，当美国主动提出无偿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小麦援助以拯救中国灾民时，毛却慨然作答：还是由我们援助美国小麦大米吧。美国驻波兰大使听后“顿现窘态”、默默无言。

许多人把大饥荒说成是苏联“撕合同、撤专家”的结果。事实上中苏翻脸后苏联取消军工项目只会有助于中国缓解饥荒，因为用来购买这些军工项目的大批食品就不必出口了，还可以因为少上些有始无终的大型工业项目而节省人财物力以度过大饥荒。并且“撤专家”发生在1960年7月，大量饿死人

的惨案已经发生。

大跃进中大规模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毛 XX 说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食品换购。与此同时，大量出口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包括用于购买搞原子弹的设备材料。另外还有肉类、食油、蛋品等的大量出口。除了出口，当时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酒精，用作核导弹燃料。若将这些出口粮食救济绝境中的农民，或者少向农民搜刮些粮食，中国那几千万饿殍一个都不会死。

四年大跃进是一场对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费，没有任何国家如此先强迫本国人民拚命干活到筋疲力尽，再把他们辛劳的结晶无度地挥霍掉。一场场野蛮、疯狂的瞎折腾，不但造成生产力和生态环境的大破坏导致粮食大减产，而且榨干了人的生命力，把农民们逼上了大规模饿毙的绝路。大饥荒年月搞成的原子弹，是建立在累累白骨堆上的。有资料披露，从 1956 年苏联正式签约帮

助搞一座重水反应炉和一台回旋加速器起步，毛时代造出第一颗原子弹总共耗资 41 亿美元，按当时物价如果以这些钱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小麦等粮食救灾，中国大饥荒饿死的几千万人全都可以活下来。为了这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相当于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炸死的人的 100 倍。

从 1958 年开始，像儿戏一样将昂贵的炮弹朝金门岛倾泻了 20 年，有时一天就打几万发。炮击金门造成台海局势紧张并将苏联绑上与西方国家对抗的战车而致苏方强烈不满，不但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两大主因之一（中苏关系破裂的另一大主因是苏联不支持毛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一发炮弹的价值相当于几百斤粮食，如此挥金如土令许多高层官员深感不解，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大胆谏言：“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毛 XX 无言以对，就指责黄右倾，不久即将黄克诚与彭德怀一起打

倒。

当年慈禧太后在太平天国造反时欲引进外国兵力助剿，曾放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被西方列强打败后割地赔款却是迫不得已。“新中国”建立后“站起来了”、“当家作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却一直对“友邦”挥金如土，对自己的人民如同家奴。大饥荒年间若将大肆出口、援外的巨额钱财、食物救济中国灾民，或者少向人民压榨点血汗，少搜刮点民脂民膏，至少可以少害死整死很多很多中国人，甚至一个都不会饿死。原云南省主席、著名起义将领龙云说“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很不合理”，主张压缩对外援助，并如实反映饿死人的情况，结果被打成大右派直至郁郁而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35年遵义会议上把毛抬上最高领导位子起了关键作用的王稼祥，1962年提出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认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惹得龙颜大怒，斥其为修正主

义的“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气一点，对亚非拉援助要少一点），王稼祥遭软禁整得精神紊乱后离世，其妻朱仲丽被打成反革命，在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

另一个奇特的大饥荒“粮耗子”酿酒，也是一个拍案惊奇的冷幽默。1937年，民国贵州省政府颁布政令，严禁在灾荒时期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否则严惩不贷。大饥荒中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为贯彻毛XX把御用的茅台酒“搞它一万吨”（当时年产200多吨）的旨意，罔顾大量饿死人的灾情，向全省连发密电强制征粮酿酒，并投入120万元扩建茅台酒厂，中央也从四川调粮给茅台。1959至1961年饿死人最多的三年茅台酒产量成倍飙升，三年总计产酒2079吨，耗粮2260万斤（5斤粮产1斤酒），产量高出正常年份好几倍，却不知道在饿死那么多人的大饥荒中，这大量的“国酒”究竟被哪些人喝掉了。

大跃进这样足以令全人类耻笑一万年也要悲痛一万年的荒唐闹剧，因“反右”压制了一切反对、质疑的声音而兴起而泛滥成灾，“右派分子”们在大饥荒中的悲惨遭遇，更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从精神到肉体的一条奴役之路、毁灭之路。新华社记者戴煌回忆当右派后在北大荒“改造”的日子：100多人睡在一间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窝棚里，零下38度的天寒地冻，每天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只有窝头、玉米渣子、黑面膜等简单食品吊命。曾任水电部副部长、毛XX兼职秘书的李锐，1958年说服毛放弃修建三峡大坝从而减轻了大跃进危害，却因庐山会议赞同彭德怀意见而获罪，1960年被流放黑龙江，每天凌晨3点就得下田干苦役，晚上9点才能收工，却只有少量野菜、豆饼充饥，幸被同为毛XX秘书的田家英相救，才没有像其他许多劳教右派那样饿死或冻死。

甘肃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活活饿死3000人、仅活出来500人的惊世骇俗大惨案（已

有《夹边沟记事》《风雪夹边沟》《回眸夹边沟》《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书籍及纪录片《夹边沟祭事》《大祭灵》等记载；譬如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土窝子里饿死一个接一个右派，为了“改造好了可以回家”而活活累死的青年，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有时一天就饿死四五十人……）；以及四川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大量劳教右派及少年儿童“小劳教”惨绝人寰的大死亡（已有不少回忆、采访文章和《大堡小劳教》纪录片等反映），不亚于二战纳粹集中营的生命大灭绝，不仅是一部浓缩了的反右派和大饥荒的血泪史，也是中国广大老百姓特别是“右派”和“四类分子”（后来统称“五类分子”）们如同猪狗一样被肆意剥夺人身自由、生存权利的活标本。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水利专家傅作恭，被其兄傅作义动员回国效力，为支援大西北来到兰州，打成右派后送夹边沟，挖排碱沟腿部长期浸泡碱水中大面积溃烂，1960

年冬一天大雪，他爬到猪圈，想抠点猪食吃，结果倒在猪圈雪地里，再也没有起来。甘肃农大教授、留美博士沈大文，1958年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1960年春活活饿死。甘肃省卫生学校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文大业，饿得受不了找一种黄茅草做成像观音土的“粉汤”充饥，形成大硬块堵在肛门拉不出来，肚子越撑越大，五六天后活活胀死了。为支援大西北从东北到兰州的省建工局工程师牛天德，打成右派送夹边沟后死于浮肿。19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土木建筑工程师骆宏远，1958年秋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送夹边沟，一次在地里干活被狼咬死吃掉了……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到甘肃省医院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农场。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海归，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专程到农场看望亲人。1960年11月，

35岁的董坚毅活活饿死，组长刘文汉按照董的遗嘱将他包扎后埋在一个雨水冲刷的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妻子顾晓颖又从上海来了，当难友们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时已不见踪影，最后在后沟里找到，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身上包的衣物已被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上哭个没完，表示要和丈夫死在一起。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把骨头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了上海。

据《南方周末》采访报道，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位于人称“死亡之谷”的黑竹沟，前有大渡河，后有八百里原始森林。1958年，四川日报记者曾伯炎打成右派后送这里劳教，他惊异地看见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孩子，正是戴红领巾的年龄，却被强迫“劳动改造”，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开荒种地。有些孩子哭喊着：妈妈呀，我要回家……

大跃进造成旷世大饥荒后，难以生存的沙坪劳教农场更处于时时饿死人的绝境中。劳教右派李世元回忆：有些同伴在翻地时抓住老鼠就吃，老鼠被吞下去前在嘴里还吱吱直叫；被活吃的蟋蟀还会咬人的舌头；大批劳教右派惨死于此。位于沙坪劳教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几千名 17 岁以下小劳教（最小的仅 9 岁），更是难以熬过饥饿的生死之关。白天，小劳教们被迫从事高强度劳作 10 余小时，稍有懈怠便遭到管理者的威吓和鞭打；晚上，小劳教们要集体学习、开批斗会，并使用了针刺乳房、牙刷刷阴道等酷刑。这些小劳教因超体力劳动、饥饿、疾病和遭受虐待而大量死亡。无法忍受强烈饥饿的小劳教们去附近偷粮食，被村民捉住后用火烧、剁下手指等，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吃毒蘑菇、生螃蟹和蚯蚓致残致死。劳教当局宣称这些小劳教都是坏人，要村民们不要同情他们。1960 年六一儿童节前一天，200 多个小劳教饿得受不了，集体去大堡镇偷东西吃，管教干部、当

地农民全体出动，手电满天，枪声大作，合力围剿小劳教……。

一个姓蔡的组长回忆：“我当年一个一个登记的，死了2600多人（小劳教）。”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认为，2600名少年儿童“小劳教”的惨死，是发生在1960年代中国的奥斯维辛悲剧，是遭受集体灭绝的惨痛记忆。

戏剧性的是，1957年参与沙坪劳改农场选址的两名四川监狱局干部，都在“反右”中划为右派，送到了他们自己选定的沙坪农场劳教。

另据美籍华人张方晦回忆，1960年，他和病残的父母、未成年弟妹等500多名上海“闲散人员”，被强迫移民到甘肃阿克塞哈萨克地区，在住地窝子的农场中经受饥寒交迫的地狱煎熬，成为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夹边沟”，500多人饿死300多，死亡比例达到60%。几十年后，他对大饥荒的恐怖印象依然极深：人都变成了求生的野兽，我亲眼

看到一个小孩蹲下大便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就爬过去，在大便里抠出未消化的玉米粒往嘴里送。快饿死的人先是浮肿，接着干瘦，整个脑袋只有拳头大，鼻子都没有了，塌陷下去了，只见两个黑鼻孔。两片嘴唇像晒干的桔子皮，牙床骨暴凸出来，胳膊腿皮包骨头，麻杆子一样。一个个大男人就这样死了，没有坟墓，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无声无息从世界上消失了。1964年，他因写文章反映这段大饥荒真相，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80年才平反，后来求学去了美国。

## 七 天府饥魂逾千万

维基百科记载：“目前中国政府仍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三年期间全国发生严峻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上下册）表明，三年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

用“自然灾害”来掩盖人为造成大饥荒

的弥天大罪，栽赃于老天爷，相当于把冤假错案从地上搞到了天上。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本文所称四川皆为重庆分治前的四川省），是大跃进—大饥荒期间被暴政和饥饿吞没人命最多、持续时间也最长的省，直到1962年还在饿死人。原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1962年6月向中央反映，四川饿死人不少于1000万，最高达1250万。同年7月人民日报机关党委书记、总编室主任萧风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调查，所写调查报告《四川情况》称：“（四川）人口，1957年7300万人……（大饥荒）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

成都作家东夫著《麦苗儿青菜花儿黄——川西大跃进纪实》（本文有若干引用）也披露，四川饿死人数超过1000万。另据上海交大历史地理学教授曹树基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的专题研究成果，1959—1961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940多万人；如果加上1958

年和 1962 年的饿殍，四川非正常死亡亦在 1000 万以上。

和平年代短短几年一个省非正常死亡 1000 万人，相当于 150 个汶川大地震夺去的生命。

四川省的饥饿始于 1958 年秋冬，结束于 1962 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一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据四川的史料及廖伯康等官员的回忆，大跃进年间涪陵地区至少饿死 300 万人，死亡人口逾三成；丰都县死于“肿病”的就有 10 万余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自贡富顺县超过 10 万人饿死；荣县人口减少 19 万，仅 1960 年的青黄不接就饿死 6 万多人。因犯“右倾”错误被贬到长宁县任副书记的泸州市委书记、邓小平的堂弟邓自力回忆，当年仅有 20 多万人的长宁县饿死了 7 万多人。

另据《简阳县志》记载，该县 1957 年人口 1233232 人，1961 年 864034 人，四年净减少近 37 万人，在全国已经公布人口变化的县

级区域中，死亡之多绝无仅有。

1959年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春饿死人最多的时期，四川巫山县在长江三峡的悬崖绝壁上铲出“毛主席万岁！”五个高耸入云的大字，每个字阔达1000平米，加惊叹号总共6000平米，耗费了极其巨大的人财物力，光是涂字的石灰浆就用掉20万斤，为此而累死摔死的右派就有5人。

涪陵地区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1959年大春收获后就开始断粮，还以“反瞒产”、“反偷盗”名义对社员进行捆、绑、吊、打，任意扣饭，造成农民大量死亡。这个管理区1958年有420户、1818人，到1961年只有344户、1138人，两年间人口减少37.4%，劳动力减少了40%。管理区有一个食堂原有141人吃饭，到1961年1月只剩70人，饿死了一半。祠堂湾食堂原有135人，死了65人，其中死绝8户。第四生产队社员郭世义家原有11人，死了10人，只剩下一个小孩。云阳县农果乡孚银忠德的娃娃和妻

子饿死后，他也耗到了皮包骨头，饿到神志不清时，就躺在地上咬自己的指头，皮肤和几个指甲盖都咬掉了，咬得鲜血淋漓，嘴上牙缝都是血。有人问他为啥咬指头，他说：“我吃……我吃的是红薯……红薯。”当天就死了。

坐拥肥沃川西平原的温江地区（成都郊县），大跃进年间总人口从494万骤降至433万，净减少61万人，算上出生人口至少80万人被饥饿吞噬；其中大邑县每五个人就有一人饿死；邛崃县道佐公社第三管理区死亡率达40%，一个土坡上6具饿殍无人掩埋被成群的老鸦啄食一空。郫县总人口由28万锐减至23万，算上出生人口不少于7万人饿死。一个流浪艺人为活命出逃，被公社劝阻站头目下令打断了双腿，还砸烂了“狗头”。

另据温江地委1961年的调查，1958年3月毛XX在成都推动大跃进时大驾光临过的郫县红光社，当年有4020人，到庆祝皇恩临幸三周年时仅剩2750人，已有三分之一的人真

的进了毛 XX 开创的乌托邦天堂。2008 年，成都严文汉先生和友人们带着摄像机到原红光社去拍摄有关资料，听当地老人讲在成都西边大致西三环外蜀西路附近，尚有大饥荒年月埋葬饿殍的万人坑。严文汉等前去实地了解，斯地正热火朝天大兴土木，继之公路、高楼林立，大批冤魂饿鬼们亦将永远深埋于城市钢筋水泥之下，乃至永远从世人的记忆中消失。

《西充县志》记载，西充人口大跃进中净减少 59430 人，算上出生人口不少于 8 万人饿死（当年西充约 40 万人）。西充乡友谢明旭著书《断层里的歌》，内有亲历大跃进的许多形象、生动的记事：“田地、房屋、耕牛、农具、猪鸡鸭鹅都归集体所有，家家户户的粮食、灶具都搜出来成立公共食堂，大人小孩都在伙食团的大瓮子锅里领饭吃。没出三个月，搜来的那点东西耗尽了，人们除了吃树皮、野菜，喝小球藻、盐井水，害水肿病外，还要在鞭子的威逼下‘白天干、

晚上干、背起太阳月亮干’地去放高产卫星。到处路荒行人少，坟乱饥鬼多。”并记下了他二哥外出多年后于1962年第一次返家时，老父亲向其介绍的情况：“大跃进三年，水肿病抵不住，院子里饿死了几十个人。……更惨的是你大姐，五个孩子，最大的才13岁，1959到1960年一年多就饿死四个。”

西充籍抗日名将、著名教育家，曾任民国四川省主席、第29集团军总司令的起义将领王缙绪，1961年活活饿死在成都的看守所，并有六个儿子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一些子女直接饿死于大跃进。我的一位西充街邻宋老师打成右派送农村改造时惨死于大饥荒，其家人亦受牵连下放农村，后来其遗孀携子女迁回了原籍营山县。文革前我在西充中学入团后时常被派“外调”，跋涉许多乡镇调查了解申请入团同学家庭情况用作“政审”，要求不但要查其家庭成份、政治背景、经济条件、有无杀关管斗等，还要了解其亲属在大饥荒中是否有过死人，以防有因饿死

亲人而有所不满的学生混进共青团。

1959年，四川实产粮食1582万吨，四川省公布的当年产量竟然高达3500万吨，结果上方按这个虚报的产量征购49%的公粮，征不够就以“反瞒产”强行从农民碗里夺粮。宜宾市在“反瞒产”中捆绑吊打基层干部2500多人，结果逼光了保命的口粮，全市16万农民饿死近4万人，差不多每四个农民就有一个饿殍。仁寿县“反瞒产”大会把全县公社干部一个个叫上台抽打，逼问“把粮食藏到哪里去了”，基层干部们吃不了皮肉之苦，只得胡乱说藏了多少多少粮食。于是农民们仅剩的一点保命口粮被收缴殆尽，致使全县饿死约20万人。

除了浮夸高产、暴力高征购刮尽农民们活命的口粮，大办水利、大炼钢铁等瞎折腾导致粮食收不回来烂在地里造成大减产，砍树拆房推灶砸锅收尽私产毁灭农民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只准在公共食堂喝大锅清汤甚至不准逃荒要饭自行逃命，从而把农民们强行

推上绝路等饿死逼死人的全国性主因外，中央从四川大量调粮，李井泉为虎作伥媚上欺下，也是四川饿死人最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回忆，四川1958年开始连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却连年增加。1958年外调39.6亿斤，1959年外调49亿斤，1960年外调68.4亿斤，三年外调粮比前五年外调的总和还多。在大量外调粮食的同时，全川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一哄而上，仅仅修水库就上了600多万人。

大饥荒中全国农民对公共食堂深恶痛绝，李井泉却揣摸圣意，步步紧跟，创造性地提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将所有生活资源集中到食堂，以极端残酷的手段禁止农民自己煮食。结果在1959年秋冬到1960年春的全国性饿毙高潮中，四川许多公共食堂停伙或变相停伙达几个月，又不准农民自己煮食，终于把几千万农民逼上了绝路。

1960年7月1日，正在饥饿中苦苦挣扎的四川人，被一个晴天霹雳震得目瞪口呆：

四川粮票全部作废！由此“节省”下4800万斤粮食，当局从万县等地抽调大批民工人拉肩扛运送出川。我的长兄王森从新疆边陲寄来5斤全国粮票，老爹刚到食堂吃了碗面条花掉2两，找补的4斤8两四川粮票恰好赶上全部作废。

据大饥荒调查者依娃采访仁天和记叙：1959年，我在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政教系有个来自四川的20岁出头的男同学，每天把自己的馒头尽量省下，拿到兰州西站黑市上去卖，一个一块钱。当他攒下500块钱时，却把自己饿死了。他死后，我们从他的日记里发现了秘密，原来他家来信说没吃的，让他寄钱回去救急。一个学生往哪弄钱？他就把自己那点保命的口粮挤出来卖掉，把钱存起来，想着假期带回家，结果没到假期自己就饿死了。政教系处理他的后事时，用他卖馒头的500块钱，给他买了一口棺材。我的另一个姓邵的同学则正好相反，他饥饿难耐中写信向家里要吃的，收到家里寄来的5

斤粮票就跑到十里店食堂，全部买了馒头、米饭，一顿就吃光了，结果活活撑死。

荣经大饥荒幸存者余习广记载，1960年春，荣经县四乡八野，尽是哭声。从各公社到县城的路上，每天都有一路倒地的死尸；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是饿死者或干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由于死人太多，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沟里扔，或者随意扔在县城北门口外那条小河沟里，任其顺流而下。一些死绝的村庄更是无人埋尸，臭气冲天，烂得只剩下骨架。

据1998年出版的《荣经县志》记载，该县1957年人口为123717人，1962年为69656人，五年净减54061人，减少率为43.7%，成为了全国饿死人比例最大的县。并因此发生了凤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持枪抢夺国库、开仓放粮、救济饥民的“反革命武装暴动”。其结果当然是轻而易举被镇压。

乐山井研县廖沛林回忆，大饥荒中他的父母、女儿、妹妹、两个姐姐、两个姐夫相

继饿死。他因参加过远征军抗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劳改、“二劳改”长达29年。1959年，他所在的打索厂劳改队天天都死人，每天专事埋尸的人挨铺清理，推推搡搡，不动弹的就抬出去。有的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同样像死猪一样拖走，免得第二天再麻烦。1960年，他们200多人又派到江镇修水利，由于很多人饿得走路打晃，一天的路途两天后还有17人没有到，队里派人去接，找到的都是尸体，有人已被野狗、山鼠撕咬得面目全非。到江镇工地后死得更快，从每天埋几具尸体激增到每天十四五具，原来医院专职埋人的两个人不够用，又增加两人，原来是一坑埋一人二人三人，后来增加到十个八个一堆埋。

毛时代以铁幕统治的极权制度和乾纲独断的皇权专制，以解放、翻身、社会主义、当家作主等动听的名义进行的大开历史倒车的“革命”，确实是一条恐怖的贫穷之路、死亡之路。廖伯康回忆1961年担任重庆市委

办公厅副主任、团市委书记时到长寿县开展工作看到的情景：成村成乡的人群因饥饿而周身浮肿，气息奄奄；到处树木砍光，房子拆来烧了，农民们家徒四壁，住宅如同猪圈；私人财产被搜光，大冬天甚至没有床和被褥；锅和灶台砸了，不准煮饭冒烟，只有一个到集体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人口大量减少，强壮劳动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惨不忍睹……

时任泸州市委书记邓自力回忆亲历的大饥荒：“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另据1961年8月四川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的调查，渠县大峡公社庆丰大队262户人家就有214户、755人吃过泥土；其中三个生产队就有13人因吃泥土致死。该报告称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龙凤咀等四处调查的结果是，被群众挖空的土估算

为 400 多立方米，挖土的约有一万人次，挖走的土 50 万斤左右。群众在挖土的过程中，由于坑少人多，还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队等候。路远的人为了不在当日爬过高山之后再挖土，头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庙学校过夜，这所学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最多时有 100 多人。

四川崇庆县（现成都崇州市）县委农村工作组组长郑大军，详细叙述了大饥荒中农村搞“坚壁清野”、饥不择食及吃观音土等情景：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饱肚子就四处巡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能冒烟。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满山疯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罕美味，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先恐后铲回家。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许多社员吃过观音土，一种有光泽的白

色黏土，饿疯了的人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为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时，就活活胀死了。有效的救治方法是灌服超量泻药：生菜油、桐油甚至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溶化胃肠粘膜，令你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宝物，人们掏山泥把山都掏亮了。

与饥饿相伴的，是农村干部打人成风，对于农民任意实施罚跪、捆绑、吊打等酷刑折磨及搜查、没收财物等各种处罚，其中“扣饭”最为普遍，亦因此造成了大量非正常死亡。四川古蔺县飞龙、彰德、玉田三个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 144 人中，有三分之一打过社员，被他们捆绑吊打的社员 124 人，其中被直接吊打致死和逼死的 33 人。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六队 70 户人家，就有 64 户被扣过饭。有的公社规定，社员不假外出、不出工、不参加会、不交野菜、不交青饲料，

一律扣饭。四川长宁县桃坪公社伙食团长以上干部 441 人中，扣过社员饭的 212 人，打过人的 19 人，捆过人的 48 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 31 人。碾坎生产队罗大娘母子 4 人病在床上，10 天不给饭吃，饿死了 3 人。大同管理区社员李友成怕扣饭带病出工，病倒田间被抬回，队长说他装病，狠踢几脚，回家即死。邛崃县道佐公社三管区二中队 43 户社员，被管区主任汪齐松打过的就有 40 户，其中 6 户全家老少人人被打。12 岁女孩汪木林饿极捡豆子吃，被汪一脚从屋里踢到屋外，又提起扔到田坎上摔死。社员汪齐青偷了两把胡豆充饥，因恐惧挨打上了吊。后据工作组调查，仅被汪齐松直接打死的即有 5 人，打后 1 至 2 月内死的 6 人，3 个月后死的 11 人，打残废的 2 人。

四川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食堂事务长徐建民从 1959 年 12 月到 1960 年 4 月，先后吊打社员 18 人。徐文普偷吃了两个红苕，被徐建民吊打后五天即死。这个管理区

还组织了一个劳改队，每晚加夜班。陈素华夫妻二人都被劳改，有一次偷偷回家给小孩喂药，被干部发现后，揪着头发拖回了劳改队。荣昌县高峰公社第十四管理区50多岁女社员杨慈民被怀疑偷鸡，押送到管理区吊打，第二天放出，杨在回家路上晕倒，管理区支部书记高某即令将杨埋掉，临埋时杨还在呻吟挣扎，结果还是埋了。

进出四川的“蜀道难”加上当局严防死守不准外出逃荒，是大跃进中四川大量饿死人的原因之一。当年进出四川的铁路只有一条宝成线，四川规定出川买火车票都必须得凭证明。由于各地严控“盲流”，普通老百姓极少有人能开上张外出的“证明”，想外逃出川又买不上火车票的不少饥民就千方百计混上列车，却难免在查票等各个环节被抓“现行”。有的人就从绵阳等地沿铁路步行，走过江油、广元、略阳，钻隧道，翻秦岭，跋涉两千里，一直走到宝鸡，然后再买火车票逃往新疆、内蒙等地。

极权统治隐恶扬善、文过饰非，没有监督力量，没有纠错机制，坏人当道好人挨整司空见惯。1959年，雅安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到荣经调查饿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被打成“三反分子”；廖伯康等亦因向中央反映饿死人问题被打成反党集团。这些整人的事尤其是四川大规模的人口灭绝，是为虎作伥的四川王李井泉为首直接干的，但背后撑腰的黑手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和强制推行者，是自称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以致于邓小平、胡耀邦、杨尚昆等党国大员，想保护向他们反映四川实情的廖伯康等党人都无能为力、无济于事。

## 八 空前绝后“人相食”

有研究表明，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民国时期，是中国自元、明以来700多年间自然灾害的集中爆发期，各种旱灾、洪灾、蝗灾极其惨烈，加上内战、日本侵略等连年战乱，中国农村极度贫穷饿死的人也相当多；

而“新中国”成立后开初的十余年，则是700多年中极其难得的好年景、好气候，却不幸发生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人为大饥荒。

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之一。中国古代有残酷的凌迟处死，将人一刀一刀割死，即千刀万剐。饿死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这个过程非常残酷、痛苦。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饥饿的痛苦、生存的本能会驱使其不择手段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动物性压倒人性，一切常人难以想像的恐惧现象发生了。

中国古代大饥荒有“易子而食”的记载，大跃进的“人相食”却有许多是狠心杀死自己的亲人充饥，甚至敲骨吸髓吃尽骨渣。一些地方全家死绝、全村人死绝屡见不鲜，无力掩埋的尸体遍布荒野田间，死人被食、杀人而食、夫妻老少兄弟姐妹之间互食、食人者又被人食……安徽亳县的人吃人包括“父母吃儿女、儿子吃父亲、杀亲吃肉和杀

人吃肉”等等怵目惊心的现象。当年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口人饿死5口。梁志远记述，亳县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全家4口人饿死3口，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亳县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王某的老婆将十来岁的亲生女儿杀死后煮吃；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将其亲生儿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后死光。观堂公社张庄张韩氏全家4人饿死2口，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打死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时时呼叫女儿的名字。亳县县委生活检查组长陆美1960年3月3日向上汇报，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多户有25户吃人肉，严重时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下地扒死尸吃。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有

些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人饿死后未及埋葬就被抢走了。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

另据梁志远回忆，亳县农村没有饿死的人由于饥饿无力，不能掩埋饿死的人，在路旁、田间、集镇街巷、食堂门口、学校教室，到处都可以看到尸体。1960年春，十河公社宋大大队薛竹园村因没有劳动力抬埋，就用一车多尸的办法把尸体拖往地里。双沟公社高范生产队因无力挖坑，就把不少尸体投在田间的枯井里。1960年10月，梁志远在十八里公社集南杨庄的肿病“治疗点”上看到，浅埋在河坡上露头露脚的尸体就有7具。

由于饥不择食，亳县因吃野草、蘑菇等中毒而死的人数以千计。五马公社丁双庙生产队高思曾家因吃臭大麻籽，一家5口全部死亡。1959和1960年的新粮接口季节，饥饿过度的农民因暴饮暴食而死亡的不在少数。张集公社北曹大队早庄生产队，1960年5月

15-24 日 10 天之内，因暴食青麦、生麦就撑死了 10 人。安徽无为县一听说有刚死的人，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当年任县派出所所长的胡大海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饥饿的原因。”

原甘肃省妇联主席李磊《悠悠岁月》及有关调查披露，大饥荒时甘肃临夏发生大量人吃人现象，全市 10 个公社 588 人吃掉 337 具尸体，其中红台公社 170 人吃掉尸体 125 具、活人 5 名。锦光 9 小队的马希顺家吃了病人的尸体，全家 11 口人全部死绝。有的生产队一天就死 20 多人。尹集公社铁寨生产队两个萝卜窖里就挖出 60 多具尸体。红台公社李家庄马有卜全家 10 口人，全死在炕上，尸体腐烂了没人埋。有的妇女死了，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吃奶。社员马一不拉夫妻把 14 岁的女儿杀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

乱藏公社社员马阿卜都临死时嘱咐女儿：

“我身上的肉没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另有对夫妻商量先吃掉两孩子保命，等以后有粮食了再生。他们先杀死吃了一个娃，觉得有力气了，又吃了第二个。为了避免中毒，他们挖来野菜和娃娃的肉一起煮食。干部到他们家发现娃娃的头和脚还煮在锅里。

1960年春，甘肃陇西县一个小伙子打死母亲，把剔下的肉腌在坛子里，藏在地窖慢慢吃，地窖里冒出的腐臭味呛着了邻居方才事发。通渭县鸡川镇苟堡乡谢振翼回忆：社员牛宗祥剁了人肉在家煮食，被公社书记知道后搜去倒在山沟里，同村一饲养员天黑后把倒掉的熟肉捡回一脸盆，暴食后胀死。据依娃采访记载，通渭县新景乡白杨林一个妇女外出把自己的小女孩关在家里，小孩饿得受不了跑出门，村里有人以给馍吃骗去杀死吃掉了。岷县铺马乡炭桥沟村一个妇女全家饿死，她饿得神经失常，将邻居家的娃娃哄

来家，杀死后用脸盆煮食。和政县一位老爷爷饿疯了杀死自己的小孙子吃掉了。甘谷县大庄乡有个老妇趁儿子、儿媳外出杀死孙子吃人肉，案发后判死刑枪毙了。通渭县白杨林一对夫妻饿得把自己女儿打死煮食，却没有给两个儿子吃，结果这对夫妻死了，没吃上人肉的两个儿子倒活了下来。

另据沙青《依稀大地湾》记载，通渭县大饥荒中一农家饿死得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孩子，一天父亲把女孩赶出去，女孩回家后看到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弟弟却不见了。几天后，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爬到灶台添水生火，目露凶光，招呼女儿过去，吓得女孩躲到门外大哭，哀求：“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了……”该县鸡川镇上店子村一户男人将自己女儿拖到外面捏死，然后拿回家剁开煮食，她的母亲毛巧妈边吃女儿的肉边哭说：“吃我自己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呢！”

原通渭县政协干部张大发回忆、记录了该县大饥荒中人吃人的大量惨况，还有一些令人心酸的“故事”。鸡川公社某村一家人，丈夫在外地工作，寄来十多斤粮票救急。这家女人用粮票把面买回来后，反锁大门，多日不出，村里人发现异常后翻墙进去，看到几个孩子早已饿死，这家女主人却不知所踪。直到十多年后才揭开谜底，原来这位女人抛弃儿女，背着面独自逃命，但她还没走出村庄就被人杀死吃掉了。另据一位干部讲述：当时我们家有6口人，父亲去了洮河水利工地，我和弟妹由母亲拉扯着。母亲不知在什么地方藏了点粮食，每当深更半夜弟妹们睡熟了，母亲就悄悄把我叫醒，将一把用石窝捣细的熟面塞到我口里，然后用被子捂住我的头，等我吃下肚子，她才安然睡去。我活了下来弟妹们却都饿死了。一年后父亲从洮河工地回来了，母亲把我交给父亲，说：“没办法，我只给你拉扯活了一个，就……就一个了呀！”话没说完，便“哇”地一声

哭倒在地。以后母亲整天哭得爬不起来，终于把眼睛哭瞎了，那时她才30多岁。

依娃采访记述：甘渭县鸡川四堡一个叫何顺祥的半大娃从食堂打来一碗稀汤，他妈妈与之争食，他把妈搽到土崖下摔死了，结果被警察抓走，关到18岁枪毙了。通渭司家川的一个饲养员从活驴身上割下一条腿，还没煮熟就开始吃，结果肠子胀破而死。通渭陇阳乡周店大队一个老妇出嫁的女儿回来看望妈妈，饿疯的老妇在半夜掐死自己的女儿，将其尸体剁碎储存，天天以自己女儿的肉维持生命。和政县三十里铺马家河大队一位50多岁的老阿娘，吃了自己一家5人：先吃了饿死的丈夫、3个儿子，最后砍死自己十几岁的女儿亠依努煮食。和政县城关镇后寨子大队阴洼村一个男人将自己的小娃娃用破被子捂死，因没有力气下炕生火煮熟，就生着啃吃自己的娃娃，最后还是饿死了。通渭县陇阳乡周店村一位老奶奶，竟然一共吃了全家7口人，先吃了饿死的6口人，最后又

把家里唯一活着的小娃娃割死吃掉了。

另据甘肃省秦安县王堡乡罗店村王碎狗老太太回忆：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她家里饿死了8人，她天天和妹妹在地里挖野菜吃。本村有饿死者因为埋得浅，尸体被狼扒出来吃，王碎狗挖野菜时挖出来一条人腿，抓在手里就啃，她记得上面已经没有血色了，只有干干的皮。秦安县冯坪村一个外地逃荒的人饿昏在路上，另一个人在他还没有咽气、腿还在一伸一伸时，就下手刮肉吃。秦安县杨湾里有个老师路过通渭县牛家坡，在河湾里被人拦住杀掉刮肉吃，家人得到消息赶来时，见到的只是一副骨头架子。

安徽颍上县公安局原局长王冠群载文回忆，该县林拐乡洪海子村女社员高士英，1960年1月将自己6岁的亲生女儿勒死后将肉煮吃，发案后被以杀人罪判处死刑。亳县法院原秘书尚振华回忆所经办的一个吃小孩的惨案，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吃掉自己的死孩后，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死于

狱中。《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1960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吃了。另据安徽亳县农行离休干部王体忠回忆：1960年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吃人肉成风，该村王某的前妻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就被干部抓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会场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肉味竟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将一盆人肉抢得精光。

湖北利川县一个9岁小孩难忍饥饿折磨，自己搓了根草绳吊死。河南信阳李世平一家和一个叫王振宇的争抢新坟尸体发生冲突，黑灯瞎火中王振宇倒地身亡，李家人不再扒坟，把王的尸体抬回家后立马割肉下锅，被村干部发现后，李世平被打死。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原籍豫南，他记录了其母在大饥荒中的遭遇。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的娘，就是把家里

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

“才两岁的妹妹死了，家里的人也都饿得不行了……一个亲戚来家，就劝把妹妹吃掉，皮包骨头，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是把肝什么的掏出来吃掉……我家族饿死6个，全村饿死100多人。”

河南信阳地区有的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饿死的人卡死吃掉，有的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固始县两个生产大队就吃了200多具尸体。河南永城鄴阳公社何全德夫妇吃人肉被发现后，公社书记授意由公社社长、武装部长等将二人骗到公社，用砒霜将其毒死以灭口。据李素立调查，在商城县余集工作的雷前修听说全家人都死了赶回家去，途中天黑时被人杀死，割肉抛尸。上石桥大队的一个算命瞎子因为长得胖，在上石桥东岗被人杀吃了。商城退休教师汪流凯回忆：他有个姓黄的表弟，到在外的哥哥那里找吃的，哥哥等了两天没有见他，后来在上石桥西边的灌河河滩上发现了他被杀的

尸体，屁股、大腿上的肉被人割走了。当时商城天黑了没人敢走路，两人行路，没人敢走前面，因为后面的人随时都可能把前面的人杀了充饥。

另据李素立记载，河南永城县荒北何庄何派澜老汉说：我们庄当时有 287 人，死 152 人，剩下 135 人。我们庄的何玉超，三个儿子，杀吃两个。杀了老二老三，要杀老大，老大跑了。又要杀吃他娘，他娘跑到我家，说儿子要杀我。后来不知他娘上哪去了。商城县双椿铺有个叫胡名新的木匠去古城找表哥，半夜里被表嫂和表侄杀死，做成了腌肉。第二天队长发现他们家有肉，就上报说他们杀牛，结果发现不是牛肉是人肉。息县项店公社陈登常将他 6 岁女儿掐死煮吃，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 20 年，死于狱中。

原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父母都饿死了，她实在无法忍受饥饿的折磨，竟

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吃了。这个案子报到张树藩手里，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批准将这女孩抓起来。他说抓来关起还有牢饭吃看能否活出来，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了。

自古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大饥荒中饿死人、人吃人的现象十分惨烈。据《墓碑》书载，1960年3月，四川灌县（现成都都江堰市）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一个潘姓妇女的丈夫死亡后，当晚深夜她带上锄头、菜刀、背篓，挖开丈夫的坟，将尸体弄回家，自己把肉吃了，把骨头冒充熊骨售卖，一斤1.5元，共卖11.75斤。四川大邑县安仁九管区女社员刘元芳，1960年4月把8岁亲生女和9岁亲生儿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原因是这两个孩子偷了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因为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逼得走投无路，最终把自己两个孩子整死。

另据当年崇庆县县委农村工作组组长郑

大军发现后所作的调查，该县东阳公社五大队第一生产队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间，发生大量千奇百怪的人吃人现象。全队总计82户491人，83%的家庭有过吃人史，尤其是女孩成了被吃的重点，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女童48人，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女童的90%。心狠下得去手的，就爹娘亲手干；不忍直接杀死亲骨肉的，就同别的父母换着下手。被杀吃的女孩个个皮包骨头，为了多吃几口，有的把骨头砸碎，在石臼里捣成骨粉吃，丁点不剩。一个叫莫二娃的因虐杀吃掉亲女又猎杀吃掉邻队两个男孩，案发后被判处死刑。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载文披露，1961年4月23日，省公安厅向安徽省委报送了一个《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人吃人“特殊案件”），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合肥市3

个县发生 201 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 1959 年冬和 1960 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 1144 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 36 起，其余 1108 起都是留作自食的。”

……

中国大饥荒期间发生的人相食惨剧，足以让人类历史上任何与饥荒有关的惨案相形见绌。倘若稍微有点把老百姓当人看的人性良知而及时刹车，采取点救助措施，大跃进造成的人为大饥荒何以能持续四五年之久？何以会造成惨绝人寰的人相食悲剧！？

大跃进中干部的腐败和特权极其突出，贯穿于各级官场。一边是普通老百姓食不裹腹、大批饿亡，甚至人相食，一边是大刮“干部特殊化风”，大肆侵吞民脂民膏。据甘肃定西地委扩大会议 1961 年 1 月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用专车从甘肃最好的兰州饭店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 1960 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 339 斤、油 23 斤、鸡蛋 260 多个，

以及火腿、鸡、罐头、水果等。河南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出入都有五六个卫士随从，去到哪里都事先打电话通知准备饭菜，到光山县一次就摆了24个菜。

而据杨继绳的采访调查，大饥荒中四川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的干部们尅扣农民口粮大吃大喝，还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致使公共食堂无米下锅；后来又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享用。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就有9人；全公社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60%以上。大足县土桥公社多吃多占的干部达68%；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竟办了20桌酒席；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们却经常私下“打平伙”（聚餐），搞“加餐运动”。

在食堂断粮、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因毛XX视察而闻名的郫县红光管理区，竟不

顾群众死活，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几个干部吃了牛肉 200 多斤。过春节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 150 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 90 多斤，还将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1960 年元旦后杀了一只重 130 斤的猪，全管区六个食堂已全部停伙，死人累累，合兴公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独柏管区党支部书记游福群这对恋人，却利用职权擅自拿走吃掉了 60 斤。古蔺县圣灯公社第九管理区五队队长张某常吃双份饭，一次社员黄文先没有出早工，张队长当即宣布扣黄的饭。黄说了句：“为什么要扣我的饭，有人还吃双份饭呢？”张队长认为伤了他的面子，命令社员毛学友将黄按倒在地，拿大粪向黄的嘴里灌，弄得黄满头满嘴都是屎。

广东南雄县始兴公社上至公社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

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公社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另据河南商城县委 1961 年的一份调查，该县何店公社高斛山大队干部经常多吃多占，有一天食堂会计黄盛年与老婆偷烙油馍吃被贫农社员杜传金的儿子看见，二人当即把这小孩捆绑捂嘴装进罗筐，半夜时摔到水塘里淹死。上石桥公社前山坎大队生产队长吴昌龙在食堂烙馍吃被社员刘保山的 6 岁小女儿看见，吴当即把小女孩按在烧红的火锅里烙，后又摔在雪坑里冻饿而死。

这种大规模、全方位的权力腐败，无不以牺牲大量生命为代价的，以致大饥荒中普通农民大量饿死却极少有干部或食堂炊事员家里饿死人。甘肃通渭县大牛沟一位妇女家里人都饿死了，但凡村里来了干部，她就一直紧跟着，等那些干部一解完便，她就去

抢人家的屎吃（据说干部有粮食吃粪便里有营养），从而活了出来，成为大饥荒的幸存者。临夏永靖县盐锅峡镇抚河村郭昌华回忆：我亲眼看见一个女人找人屎吃，她把路边那个大粪吃了，就死掉了，那个女的也就20来岁。

## 九 人居、生态全遭殃

多年来无节制的资源消耗，水土流失、河湖干涸、土壤恶化、水质变坏、沙漠化、沙尘暴、温室效应、空气污染、雾霾弥漫、食品药品问题频发等等，像一把利剑高悬在中国人头上。一些人把中国的生态环境毁坏完全怪罪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远远忽视了毛时代尤其是大跃进时期造成生态、人居灾难的历史渊源、严重后果。

中国自然生态和人居环境的大破坏，在野蛮掠夺、坚壁清野“大跃进”的胡作非为中，达到了最高潮。那年月在毛XX一道道无人敢违逆的旨意下，不但把“与人斗”的阶

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得昏天黑地，而且把“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与天斗”、“与地斗”搞得风生水起，对自然生态和人居环境的毁灭性破坏极其惨烈。

那年月为实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梦幻，强迫人民像牲口一样无休无止下苦力——没日没夜大搞“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改天换地”；大举毁林、填湖“开荒造地”；停工停产，荒废农田，强制千军万马“大炼钢铁”、“大办水利”；不惜民脂民膏，大搞一波波荒谬绝伦的“发明创造”；搜光农民们赖以生存的私人财产，包括砸毁灶台、锅碗不准自己做饭吃；甚至大举拆毁民房，活生生把许多农民变成居无住所的“野人”，或多家多人挤住一处的“囚徒”。一系列野蛮、疯狂的瞎折腾，不但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能力，而且因乱挖滥伐、水土流失、树木砍光、房屋拆毁而造成生态和人居环境大破坏。

“大办水利”作为大跃进的“开篇大

作”，上亿人被强制投入到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里下苦力，累死饿死多少人还导致泥石流滑坡、河流淤积和洪水泛滥。搜光金属用品“大炼钢铁”，拆掉农民的茅屋和土墙做肥料，或铲光地皮用柴草“熏土造肥”，再“深耕十丈”放卫星，毁灭了自然资源和农民财产，进一步造成了人居、生态环境破坏。1958年举国“除四害”几乎将麻雀灭绝（当年全国消灭麻雀20亿只；北大全校停课停工三天专灭麻雀，取得消灭麻雀502只的战绩），1959年全国即发生麻雀作为害虫“天敌”覆灭后的大面积虫灾。大凡可以抓到的蛇虫蛙鼠等小生物悉数成了饥民们的美食。无不都付出了破坏生态平衡、牺牲生态环境的代价……我小时候亦曾参加全民上山吼麻雀，下乡参加“大办水利”、春种秋收等各种劳动，映入眼帘的是茂密的林木、青山绿水，但在大跃进后再下乡，看到的只是一望无垠的荒山秃岭。

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强制并村居住，

把山上树木和农民住房砍光、拆光、烧光，短短几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森林毁灭和人居环境破坏。1959年4月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在济宁调研时向上书面反映，“全县几天之内移村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山东寿张县短时间即强拆民房53000间，挖掉祖坟38000座。广东南雄县为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强拆民房105户932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座，并用炸药和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拆除前要求群众一天搬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被拆掉住房的群众住牛栏、粪寮，痛苦不堪。河南临汝县扒光村庄50个，群众被迫迁村130个，扒掉民房21966间，荒芜土地54950亩。

刘少奇1961年春返乡视察时记录，天华大队公社化前有1415间房屋，经历大跃进的横祸后只剩下破烂不堪的621间。

上海奉贤县1958年11月在消灭棉花红

铃虫的工作中，将放过棉花的 2131 间房子全部烧掉，在“拆屋并村”时又拆掉房屋 2146 间。被拆房屋的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淋雨受冻、气愤发疯，有的叫苦连天、碰头打滚。在“大办水利”时，为了铺设运土方的四轮车木轨道，将全县 9000 多台织布机全部拆掉，连社员的门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还挖出墓地里 8000 多具棺材。掘墓时既不征得墓主同意，对尸骨也不做善后处理。

四川荣县大举并队、并食堂、并房屋，长山公社 2870 户就有 1133 户遭拆房被迫搬家。仅有 20 多万人的郫县拆毁房子 12000 多间，仅毛 XX 视察过的红光公社合兴分社就毁灭房屋 2768 间。为沿成灌公路搞一条“高产带”，数千间农舍一夜之间强行摧毁，几十上百农户如同囚犯般挤住到一处。许多地方拆房子时根本不同社员商量，私自砸门撬锁，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一堆瓦砾。有人外出一趟回来不见自己

的房子和妻子儿女，只能伤心痛哭。由于大量民房被强拆，有的社员一年搬家七八次，各种财产、牲畜也因搬迁而遭受巨大损失。集中住地拥挤不堪，有的不得不住猪圈、牛栏，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间房，有的公婆儿媳同居一室，在这一间房子内还要关鸡鸭，又挤，又脏，又臭。大跃进年月我看到的西充城郊鹤鸣新村、烽火新村、刘家嘴新村等，也都是1958年拆毁农民住房，强制集中居住，乱砍滥伐树木修建的。

一系列鞭子驱使的苦役和疯狂的蛮干，毁尽了田园也榨干了人的生命力，严重破坏了人居、生态环境。大跃进的大破坏加上持续多年大搞“以粮为纲”的毁林开荒、填湖造地、弃牧开垦、围海造田和“向自然开战”、“农业学大寨”等等，一系列与天地宇宙为敌的“战天斗地”，致使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急剧恶化，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创伤。

1957年，以“圣人出，黄河清”等颂扬

毛 XX 的理由，将黄万里教授等反对人士打成右派而强行上马的三门峡水库工程，耗费了巨大的人财物力而造成黄沙堵坝、渭河水倒灌、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几十万人移民的血泪史，几经改建、反复折腾几十年后依然面临着无法解脱的顽疾。

1958 年，湖南省组织大批农民迁移到洞庭湖区围湖造田，建立许多大坝围堵洞庭湖水，使得历史上的“八百里洞庭”变成了“三百里洞庭”。

新疆罗布泊曾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1958 年尚有 5000 多平方公里湖面（相当于五个西充县大），由于大跃进对上游河流的野蛮开垦而没有河水再注入，到 1962 年整个罗布泊即完全干枯，很快成了荒漠戈壁。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我国最好的天然草原之一，却在 1958 至 1962 年开荒 20 万公顷，仅仅两三年后，最肥沃的草原牧场即伏沙出露，形成流动沙丘，逐渐掩埋草场。辽阔大草原的“风吹草低见牛羊”，许多成了“风

吹黄沙无牛羊”。

1958年，甘肃省搞“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条长达1400公里、翻越800余座山岭的大水渠，试图把洮河水引到黄土高原。参加施工的17万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居，席地而卧，在山里采野菜合着自带的干粮充饥。拼命折腾了三年，无数民工葬身工地，还加剧了甘肃省的大饥荒，结果一滴水没引来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

兰州是一座两山夹抱、黄河中流的西北名城，1930年代尚有树木茂盛的“林泉幽闲”“林木葱郁”之景，由于大跃进时期的乱采滥伐，兰州的植被急剧减少，留给人们的只是绵延横亘的荒山，给人民生活和城市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

曾以山清水秀闻名于世的“陇上小江南”、大熊猫栖息地甘南舟曲县，其森林资源在大跃进时期遭受掠夺性破坏，加之持续进行大面积开荒、毁林，导致水土严重流失和生态环境的超限度失衡，加剧了洪水、滑

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直接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存安全。

以“植物王国”和动物、森林资源丰富著称的云南省，大跃进期间遭受严重的生态和资源破坏。1969年起，云南又组织10万人从昆明西山开采、运输大批土石方搞“移山填湖，向滇池要粮”，活生生填埋3.5万亩滇池湖面建农场，严重破坏了昆明地区的水陆生态。滇池农场建成后年年亏损，财政补贴1000多万元依然无法养活农场，拖到1982年被迫停办。

北大荒农场先后接受京津沪等地下乡知青100万人，这些兵团知青挥动原始的锄头、铁锹，冒着零下几十度的风雪严寒战天斗地建“粮仓”。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内陆湿地，短短十几年北大荒自然生态急剧恶化，内陆湿地濒临消失。广东生产建设兵团数万知青和农垦职工在浅海垒起石头堤坝，削山填海，使“海滩变良田”，然而一场黑潮冲毁堤坝，卷走房屋，死亡数百人还欠下

了一笔生态账。

湖北省从大跃进进到 1970 年代，湖泊大量消失，产林县大幅减少，成林、过熟林蓄积量下降了 50%。由于上游森林植被锐减造成水土流失、水库淤积等原因，1975 年 8 月河南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 56 座水库（大多是大跃进中以打死饿死多少人的代价修建的低劣水利工程）在特大暴雨中垮坝，千里中原一片汪洋，至少 8 万人丧生洪水。

一系列逆天理败人伦的愚蠢蛮干，从大跃进进到文革末期不到 20 年，中国的沙漠化面积超过 1949 年以前的历史总和，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300 万平方公里。据中国社科院报告，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四省区 1960 年至 1962 年新垦荒地 1000 多万亩，新疆 1949 年以来所开垦的 333 万公顷耕地，大多是以以前的优质牧场，由此造成了牧场和森林面积锐减，成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五灾”俱全、“四料”奇缺的重要原因。

历来生态环境良好的四川省，1958 年前

森林覆盖率 33%，到 1980 年已剧降到 13%，短短 20 年森林资源毁掉了一大半，生态环境的破坏极其惊人。西充县大跃进中的森林毁灭是我亲眼所见，以后的情况越来越严重，1970 年代我离开西充去外省谋生后，听说西充没柴烧甚至烧红苕干做饭。若不是大跃进后赤地千里的洪荒，“苕国”人谁愿意把自己千辛万苦制作、用以度荒的红苕干当柴禾烧呢？一些西充老同学反映 1970 年代的生活之苦甚至同大跃进-大饥荒有得一比。

西充县城两河汇一河穿城而过，传说当年张献忠君临西充时感叹“一城包三江，必定出帝王”。后来张献忠战死于西充凤凰山，绝了“出帝王”的美梦，但那宛如腰带的“三江”直到 1950 年代还是我等孩童戏水的绝好去处。然而自从大跃进砍树、拆房、挖祖坟，烧光、搜光、刮光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后，三条小河逐渐成了水量骤减的死河，1970 年代起成了令人生厌的臭水沟。直到 2000 年后痛下决心进行大力度的“两河治

理”，方才基本上消除了死臭现象，新建了河岸景观，改善了人居环境。

我离开西充前夕，大概是1970年，久卧病榻的老母想吃水果，我干活下班路过街边小贩处买了一个广柑，称下来说要3毛3分钱，我掏遍腰包找出3毛2分，差了1分钱，小贩就硬是不卖，气得我差点动粗才买到手。那时的3毛多钱不是小数，一个广柑卖这价钱不可谓不贵，盖因为大跃进中林木毁光水果成了稀有之物。

那年月四川各地的生态环境损害都极其厉害。一年夏天我在川大校门口的锦江边洗脚时，忽然感到脚底莫名发痒，一看竟然有条寸多长的蚂蟥钻进脚底肉里，幸好赶紧用毛巾捏着拔了出来。当时成都府南河成了藏污纳垢、排泄各种生活和工业污水的大动脉，河边垃圾随处可见，河水的污染相当严重。接着又拆掉皇城修毛氏“万岁馆”，把御河、金河改建为防空地道，并截流三道河，填埋蒋家堰、砖头堰……经过一系列填湖埋

河的“建设”，白家塘、王家塘、莲池街、水碾河、小河街以及半边桥、青石桥等许多叫河、塘、池、桥的地方，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名字。“水润成都”的城市景观成了绝唱，成都也逐渐变成了“尘都”。“水绿天青不起尘”、“花重锦官城”的生态美景成了远去的历史。

毛时代中国社会接连不断的震荡与破坏，导致了中国人民连绵不绝的痛苦和灾难，生态和人居环境的大破坏，则进一步加剧了广大农村极度的贫穷与落后。与外界完全绝缘后被暴政和谎言成功洗脑的中国人，还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中等待自己去解放。1960年代中苏论战时说苏修污蔑中国人两口子穿一条裤子，其实这“两口子穿一条裤子”或“大姑娘没裤子穿”，确实是当年中国农村贫穷到极致的实情。

公安部老干部晏乐斌回忆1960年冬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时到水城县参加整风整社的

经历。水城后来隶属六盘水市，也是1977年我考上大学前生活工作过的三线基地。晏乐斌说那年冬天他自带行李住进水城尖山坝公社嵩枝管理区总支书记杨书记家里，发现杨书记一家三代七口人挤在30多平米的简陋土房内，到晚上睡觉时他带去的被子已被这家的姑娘打开钻了进去。而当这个18岁的姑娘极不情愿地让出被窝站起来时，竟然是赤条条一丝不挂。杨书记说她们母女俩就只有一条裤子轮流穿，当妈的穿了裤子女儿就只有赤身裸体了。他说女儿没床平时就睡柴草堆，恳求晏乐斌和自己女儿同挤一个被窝，晏乐斌无论如何不答应，钻进柴草堆里熬过寒夜，离开时还脱下一条裤子送给这家人。

直到改革开放真正开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后，以“大跃进”为最烈的毛时代生态环境大破坏后毫无承载力和再生能力的土地、河湖、山川竟然如此脆弱，如此经受不起开发利用，很快呈现出塌方式的生态崩溃。改开以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不可谓不大，并且依

然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邪路”，但毕竟有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其与毛时代尤其是大跃进年间自然生态、人居环境大破坏进一步导致贫穷、落后、饥饿、死亡和当奴隶下苦力，还是有着极大的不同。这是我们在讨论生态环境和污染问题时理当有所区别、客观看待的。

1960年7月26日，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XX！彭德怀万岁！”

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像拎小鸡一般拎进中南海。女子来自湖南衡阳，名叫刘桂阳。当问到“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时，青年女子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脚镣还在地下打滚、挣扎，声泪俱下地

哭诉：

“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今年5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我

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着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中央办公厅留守人员不敢耽搁，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正在北戴

河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

1960年上半年，大饥荒中饿死人最惨烈的时期，神州大地饥魂暴增，鬼哭狼嚎，毛XX仍在号召“继续跃进”。这个湖南辣妹子的哭诉如同当头棒喝，震动了中共高层，不知是否震动了铁石心肠的毛皇帝？

饿殍遍野、百业萧条，满目荒凉、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形势，终于迫使毛XX不得不放下面子，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做出让步，同意了李富春、周恩来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实际上就是“调整”政策），暂时同意了刘少奇等不再搞大跃进并解散公共食堂、退还农民私产、允许承包土地、尽快恢复正常的主张，各地农村无法无天的胡闹有所收敛，饿死人数大量减少，全国形势逐渐好转。至1962年初，毛认为“让步”已够，遂召开了全国县委书记

记以上干部全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提出重新开始大跃进及大幅提高征购量，引发与会者普遍不满、大倒苦水，反映出大量骇人听闻的惊人灾难，迫使毛不得不放弃再搞“大跃进”主张并继续降低粮食征购。长达几年，饿死、打死、逼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开始收场，除李井泉领会圣意顽固坚持致使四川1962年仍在饿死人外，全国总体上较快走出了大跃进造就的地狱。

## 十 旷世大难的演变和反思

政治高压的恐怖，中邪发疯的盲从，鞭子驱使的苦役，猪狗不如的打压，排山倒海的荒唐蛮干，铺天盖地的吹牛撒谎，扫荡殆尽的人权、私产和思想、说话的自由……终于逼出了一场旷古绝伦的大灾难、惊世骇俗的大饿毙。

中国那场非正常死亡——打死、逼死、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大饥荒的真相，由于大多死于偏僻的农村、各级各方严

密的封锁、疏而不漏的社会控制、所有媒体不敢报道等原因，几十年来一直被深深地掩盖着。以至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到文革前最后一年1965年，人民日报每年10月1日的头版特大新闻，竟然全是《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其中1960年“盛大招待会”的报道称：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佳宾满座”，“四千多中外人士欢聚一堂，相互频频举杯”，会场“喜气洋洋，全场欢声不绝，掌声雷动”，“完全变成了一座……欢乐之宫”。

1960年光是饿死、打死、逼死等非正常死亡，就超过了日本侵华十多年屠杀中国人民的总和，不知这国难年份的“盛大招待会”的欢乐气氛是如何营造出来的？难怪那些年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声称他们最盼望的事，就是到人民大会堂去大饱口福、大快朵颐。

1960年饿死人最多时，毛XX曾作秀“半年不吃肉”，却只是不吃猪肉，据官方出版

的毛《遗物事典》记载，1960年代初毛享受的各式牛羊鸡鸭鱼虾美食就有七大系列至少几十道佳肴，还要从香港专购澳大利亚麦片，从武汉、长沙专机空运活鱼。毛出行的德国进口豪华专列犹如移动宫殿，到行宫一住下来整座山都要清空，如坐飞机则中国所有的飞机都要停飞。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历经十多年全国采访和查阅档案资料，写就反映大跃进-大饥荒真相的近百万字巨著《墓碑》（本文有若干引用），为那场被深深掩盖的人类大劫难留下了一部恢宏的历史实录。不少中国人认为，大跃进几年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造成了天文数字的超大规模死亡，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异数，无论是其人祸的惨烈程度还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之多，绝对空前绝后：前无古人也不可能再有后来者。

然而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

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超大规模死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周恩来还亲自下令并监督销毁了各省报上来的关于人口减少了几千万的资料。上世纪80、90年代各地修编县志等地方志时，当地大饥荒饿死人的历史及非正常死亡数据不准入志，各地现存的有关大跃进-大饥荒档案资料至今保密，不许查阅。

我也感慨“解放了”“新社会”“当家作主”等等虚幻的欺世盗名的概念长期被人喋喋不休地念叨时，大饥荒那数以千万计的冤魂饿鬼们若九泉有知，当会作何感想？1959年反右倾时，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等，因采取了一些救灾救命措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要跳洛河。郟县转业军人杨心田给工作组干部

提了意见遭毒打被迫外逃，成都市公安局将杨作为流窜犯抓回来，被斗争后没几日就丢了性命。1961年，陕西“农民思想家”杨伟名联合几位党员干部写出《现在形势怀感》等文章，提出“初期社会主义”理论及如何发展农业经济的真知灼见，受到中共西安市委、陕西省委、中共西北局的高度评价，却引起毛皇帝龙颜震怒，杨伟名和妻子被逼服农药自杀……毛时代残忍血腥的皇权专制，迫使全体国民三呼万岁跪地为奴，包括一干党国大员也如同家奴、动辄得咎，与“站起来了”“当家作主”“主人翁”“为人民服务”的说教，有着多么巨大的反差！

直到1976年毛死妻囚后枷锁迅速打破，思想冲出牢笼，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许多历史真相的逐步揭示，大跃进-大饥荒的惊人灾难方才渐渐浮出水面。三四年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即习惯说的饿死人数量，据许多学者查阅档案资料、采访幸存者和当事人回忆等进行的各种研究，得出的大饥荒

非正常死亡数据，有 2000 多万 3000 万的，也有 4000 万 5000 万乃至更多的。而据 2005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同意有限制解密的大饥荒年代“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3755.8 万；如加上这个统计未计入的 1958 年及部分省级地区数据，这一权威的“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数，肯定不少于 4000 万。

据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国包括中国披露的比较高的也比较一致的数据，全世界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人口为 1000 多万，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人口为 4000 万到 5000 万。二战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长达七八年时间，而中国一个国家在和平年代的短短三四年，却造成了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亡总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超过了 100 个南京大屠杀，相当于 150 个唐山大地震或 500 个汶川大地震造成的死亡。

而据陈玉琼、高建国发表在《大自然探索》的论文，1949 年之前的 2129 年中，中国

共发生 203 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总共造成了 2992 万人死亡。这是洪灾、旱灾、风灾等各种气候灾害造成的死亡总人口，自然包括因灾饿死的人。中国现代史上“新社会”短短几年大饥荒饿死的人，甚至超过了以前 2000 多年饿死人口的总和！

另据 1947 年 2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从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3 日的八年抗战期间，全国军民战争死亡总人数为 572 万多人，其中军人 1328501 人、平民 4397504 人。和平年代短短几年“大跃进”饿死打死逼死的人，竟然相当于八年抗战全国死于战争总人口的 7 倍！

袁隆平曾毫不讳言地说他之所以几十年如一日寻求水稻高产之路，就是深受大跃进—大饥荒刺激：“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饿死者）倒在田坎地头，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的啊！”

如何搞农业生产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

1949 后被毛 XX 折腾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直至搞得尸横遍野、亿万生灵沟壑中。那些年美国以不到 5% 的农业人口养活了中国还大量出口粮食，中国农业人口超过 80% 却老是吃不饱饭。那时长期时兴“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保吃饭，各行各业都要支农包括我自己上中小学时就不时下乡无偿效力，没有固定工作靠打零工吃饭的城市居民们被赶下乡“义务劳动”，更是年复一年的家常便饭。这种全国人民搞饭吃却总是吃不饱饭的怪现象，到改革开放对人民“松绑”后顷刻烟消云散，包括农村人口大量外出打工好多农田抛荒依然从未缺粮甚至还为粮食卖不出去发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场大饥荒完全是由剥夺人民生存权利的人祸造成的特大惨案。而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看，中国学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超高速发展，在“复辟资本主义”后并没有“千百万人头落地”而是“千百万猪头落地”，回想那年月对于中国人民的欺骗、愚弄和谎

言洗脑，真的要笑掉大牙了。

由于高度集权的、事实上的皇权专制，经过 1949 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直至 1957 年至少 50 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而全民遭“封口”，堵塞了一切言路。在封锁群众信息来源的同时，统治者也封锁了自己的信息来源，不容易听到真实的情况，更听不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从而使得高度垄断的极权制度很难具有纠错能力。而民主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具有纠错机制，具有监督力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说：“人类的饥饿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所以诸如苏联的乌克兰大饥荒、中国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朝鲜持续多年的漫长大饥荒，都没有在民主国家发生过，包括印度这种非常贫穷的人口大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饿死人的持续性、大范围的饥荒。

早在 1958 年，大跃进造成的大灾难逐渐

暴露，不少地方就已发出饿死人的信息，其中云南省当年 38 万多人患浮肿病，死亡 39 万人。到 1959 年 4 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 15 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 2517 万人。这些省市的报告毛 XX 不仅看了，而且都有批示。毛亦因之提出纠偏，但毛的一切纠偏措施以不伤及他提出及力主的“三面红旗”为限，而“三面红旗”恰恰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毛不敢正视他自己“亲自发动和领导”大跃进的严重错误，总是夸大大跃进的“成绩”，总把“成绩”和问题说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纠偏时只能谈“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绝不能怀疑“三面红旗”，影响自己的主张和威望。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挺身而出，如实反映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希望认真纠错时，由于违反了毛只愿对大跃进的一些细枝末节纠偏、绝不能全局纠错从而有损大跃进、人民公社和自己的威望，致使毛歇斯底

里勃然大怒，不但把彭大将军打落马下，而且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纠偏措施来了个急刹车，使1958年的那种错误政策进一步泛滥开来，从而使原本打算降温的大跃进更加疯狂，大饥荒亦因之猛烈加剧并持续到四五年之久。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灾难，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灾难。毛XX在庐山会议上裹胁全党对彭德怀施以“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的火力攻击时，曾经怒发冲冠地发下毒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表达了他不惜一切代价将大跃进进行到底的决绝与固执。1959年庐山会议从发现问题想予纠正的原意，转变为变本加厉扩大错误“继续跃进”，维护了极权制度，强化了皇权专制，起到了杀鸡吓猴、迫使中共高层面对国之大难也不得不盲从的恶劣作用，使得偌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再没有人敢对毛的胡作非为说一个“不”字。

“大跃进”是毛XX狂热冲动的产物，是

一场因“伟大领袖”好大喜功、狂妄自大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由于一党独裁变成了一人独裁，毛的行为失去了任何制约，庐山会议不仅没有达到纠错目的，而且以“反右倾”继续放大错误，1959年上半年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进而将大跃进推向无底深渊，推动中国加速往火坑里跳，造成了远远超过庐山会议之前的生命大灭绝。尤其是1959年秋冬至1960年春的短短半年时间，由于大搞“反瞒产私分”的暴力逼粮、酷刑打压，其所造成的打死逼死饿死等非正常死亡，绝对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哪怕是任何大规模的战争中短短半年时间所能造成的人口死亡。

而从社会背景和制度根源上看，建政之初以掠夺方式杀害了200多万农村精英、优秀种田人（地主等）的暴力土改，以镇压反

革命名义和朝鲜战争掩饰实施的大屠杀，枪毙了诸多国军抗日将领、社会精英人士，加上以取缔会道门和迷信组织名义对宗教信仰的残酷打压，摧毁了几千年的农村人文生态，毁灭了传统的国民性，造成了普遍的道德堕落，从而为暴政和暴民的泛滥成灾首开先河；三五反、三大改造、反胡风、肃反等运动，接连不断整人害人，制造冤假错案，大搞暴力统治和政治倒退；迫使人民终生为奴的统购统销，户籍、粮油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消灭个私经济大搞穷过渡，从而把“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全民枷锁制”、“全民空有制”；加上从物质到精神各个角落的严密控制、全面专政与穷尽古今的政治高压、思想改造、反复洗脑……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任何极权制度能够将人类的彼此相残发挥到如此恐怖的极致。这也是这场使全人类笑掉大牙却又无比悲痛的大跃进-大饥荒之所以能没有阻力、顺利发生，以及出现各种丧失人性、互相残害，不断打

死整死饿死人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1960年代四川资阳县一位汪姓男子结婚，却拿不出什么招待客人，新郎为摆脱尴尬随口说了句玩笑话“我们最好成立个中国人民改善生活党”，当天夜里新郎、新娘和到场贺喜的亲友即悉数被捕，全部以“成立反革命党派”治罪，新婚夫妇双双判处无期徒刑。

1959年7月，大规模饿死人发生之前，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张凯帆听说其家乡——渔米之乡无为县左祸猖獗民不聊生，来到无为调研后提出解散公共食堂、退还社员房屋和自留地、允许农民养鱼虾充饥等救灾救命措施。无为人民庆幸终于能够活出来了，许多地方也看到了一线逃命的生机，变相剥夺老百姓吃饭权利的公共食堂在安徽省顷刻垮掉了80%。岂料毛XX龙颜大怒，痛斥张凯帆“投机革命”、“大闹无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钦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在安徽的代理人，并株连到全省各级干部，仅批斗处分的无为籍

干部就有 28741 人，张凯帆家人亲属被整死 20 多人；农民稍有不满意就被逮捕甚至遭枪杀，以致监狱人满为患。致使大跃进的祸害急剧膨胀蔓延，安徽不幸成为大饥荒死亡率最高的省，绝对死亡数仅次于四川。无为县总人口 1957 年底 982979 人，1960 年底 662557 人，三年净减少 320422 人，总计饿死 30 多万人，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南京大屠杀。

如果不是毛 XX 将一党独裁搞成一人独裁，如果张凯帆的救灾救命主张能获得起码的尊重而不是有违旨意就往死处整，如果彭德怀等正直党人反映人民疾苦和极左祸害的“为命请命”，能获得人性的对待至少不亚于正常的君臣关系（且不说民主），而不是以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丧尽天良、心狠手辣的流氓习性挟私报复打翻天印，从而不顾人民死活，将已经造成巨大灾难的“大跃进”进一步推向恐怖的深渊，何以会使大规模饿死人的旷世人祸持续四五年之久？何以会造成庐山会议后中华大地惨绝人寰的生命

大灭绝！？

1957年由“帮助整风”转变为打翻天印的反右派和1959年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而挨整的反右倾，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大搞流氓政治的典型表现，并直接导致了大跃进恶风劲吹、群魔乱舞、危害不断升级，不但造成了超大规模的饿毙，还造成了对于社会人伦、道德意识、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大规模、深层次的破坏。“大跃进”的弥天大祸发生后，由于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算，毛XX对饿死几千万人的旷世大难毫无悔祸之心，反而担心迷信破产、大权旁落和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追究大规模打死、饿死人的责任，从而在最惨烈的非正常死人事件发生后，先是把责任推给“自然灾害”和下面干部，接着高高祭起阶级斗争大旗，扬言大跃进的祸害和基层干部的胡作非为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坏人破坏”或“资本主义复辟”，必须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为大饥荒找替罪羊；接着大举反攻倒算，大批“黑

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对刘、邓等推行的缓解饥荒、走出困境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横加指责、轮番发难。大跃进前期紧跟毛的路线造成天量饿毙、后期良心发现支持农民生产自救的安徽第一书记曾希圣遭到毛的整肃；忠实执行毛的指示造成9万多人饿毙的河南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深感内疚，不堪“坏人当道”重压举家自杀……延至大饥荒刚刚结束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从党国官员们不太注意的“文化”方面着手，开始全力反攻，大搞个人崇拜和愚民政策，一门心思算计如何将主张发展经济、收拾残局的刘少奇及其支持者搞下台并换上老婆江青等自己的人，从而把“党天下”搞成“家天下”，以彻底掩盖饿死几千万人的弥天大罪。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为害更广更烈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

人性的感知并不总是与善恶是非成比例

的。惨死一人两人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愤怒、同情和舆论的关注，惨死成千上万的人却可能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被漠视。冤魂不能总淹没在“大数据”里，血海泪河不能永远冻结成冰冷的数字。因而，灾难之后若没有对于真相的揭示、冤魂的祭奠及对于责任的追究，便难以有精神的复活、罪恶的鞭挞及深刻的反思，类似的悲剧依然有可能重演。极力隐瞒、掩盖大跃进-大饥荒的真相，没有清算其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匡扶正义及进行必要的追责，终于使得方向性、政策性、制度性的严重错误卷土重来，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持续灾难，付出了更大更深更广的代价。

任何国家与民族的记忆，尤其是以暴力和谎言酿造的苦难历史，都不应该遗忘、篡改或抹去。以采访土改、反右著称的谭松先生坦言：“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乃是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幸。”苏俄十月革命 100 周年时纪念苏联政治迫害遇难者

的大型雕塑“悲伤之墙”在莫斯科揭幕，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并致辞：对于我们所有人，对于未来的时代，了解并记住我们历史上这一悲惨时期是非常重要的。这段可怕的过去不能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我完全赞同“了解，记住，审判，这之后才可能原谅”这句话，我们的义务就是“不忘记”。“记忆本身、评价这些黑暗的历史事件所持立场的清晰和明确，将是避免历史重演的强大的警示。”

然而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人知晓大跃进—大饥荒被深深掩盖的真相？究竟有多少人能想象到那惊天地泣鬼神的野蛮和苦难？究竟有多少人认同“了解，记住，审判，这之后才能原谅”这个朴素的道理？……那死于惨绝人寰黑暗时代的几千万罹难者、天文数字的冤魂饿鬼们，几十年了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又能从哪里找到为这些可怜的亡灵同胞树的什么碑立的什么传或有过什么样的纪念活动？又有多少直接或间接整死饿死他们的人，表达过哪怕一丁点儿忏悔或说明过他们无端堕落进地

狱的原因，从而还历史一个公道以慰藉他们的在天之灵？并让活着的中国人认真总结这一沉痛的教训，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以有利于现代中国的健康发展和民主进步呢？这也是本文回顾大跃进-大饥荒的惨痛经历，希望人们不要遗忘那样一段痛苦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原因。

祈愿六十年前惨死于大跃进-大饥荒中的所有冤魂安息！

*(2018年8月初稿于成都。经多次修改、补充，2020年8月定稿。全文68000字)*

~全文完~

本电子书是非赢利性参考资料。本着交流学习的目的，仅供读者试阅，不得用作商业用途，并请下载后一天内删除，如喜欢本书，建议读者购买以支持正版！

